

第四章 全面抗战的高潮

第一节 武汉会战前的政局

一、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和《抗战建国纲领》

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珞珈山召开。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居正等17人组成大会主席团,由叶楚傖任秘书长。汪精卫、叶楚傖、何应钦、王宠惠、孔祥熙分别在大会上作了政治、党务、军事、外交及财政方面的报告。

《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指出:“中国现正从事于四千余年历史上未曾有的民族抗战。此抗战之目的,在于抵御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以救民族国家于垂亡;同时于抗战之中,加紧工作,以完成

建国之任务”。^① 强调“抗战”与“建国”并重是这次大会的基调。

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订了《抗战建国纲领》，它计有 32 条，分为总则、外交、军事、政治、经济、民众运动、教育等 7 项，是抗战初期国民党的全面政治纲领。

《抗战建国纲领》在总则中规定：“三民主义暨总理遗教为一般抗战行动及建国之最高准绳；全国抗战力量应在本党及蒋委员长领导之下，集中全力，奋励迈进。”^② 在外交方面，则主张以独立自主精神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国家和民族，制止日本侵略，否认日本在中国领土内扶植的一切伪政治组织。政治方面，则准备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虑及识见，同时加紧完成地方自治，为实施宪政作准备。军事方面，对军队实行以抗战建国为宗旨的政治训练，指导、援助各地武装人民，在各战区司令长官指挥下，与正式军队配合作战，并且在敌人后方发动普遍的游击战，牵制消耗日军。经济方面，以军事为中心进行经济建设，实行计划经济，扩大战时生产，全力发展农村经济，推行战时税制，统制银行业务，巩固法币，统制外汇，管理进出口货物，严禁奸商屯集居奇，实施物品平价制度。民众运动方面，发动全国民众，组织农工商学各职业团体，使有钱者出钱，有力出力，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予以合法的充分保障。

《抗战建国纲领》制订之际，华北日军已进抵台儿庄，有进窥徐州之势，战争形势相当严峻。国民党自全面抗战开始以来，一直依靠政府和军队的力量进行抗战，从而导致了在华东、华北各个战场上节节失利、伤亡惨重的局面，血的教训使国民党意识到只有深入

①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第 461 页，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5 年版。

②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第 485 页。

动员社会各阶层的力量,才能坚持持久作战,战争的胜负不单纯取决于武力,至关重要的是敌我双方总体国力的长期较量。国民党为争取广大民众支持政府抗战,采取了一些较为开明、进步的措施,《抗战建国纲领》的制订便是这些开明政策的集中体现,它得到了各党派的赞同。4月13日,国家社会党首领张君劭代表国家社会党致函蒋介石、汪精卫,赞扬了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申述该党主张与三民主义最高原则在精神上并无二致,表示今后“愿本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之意旨与国民党领导政局之事实,遇事商承,以期抗战期中言行之一致”。^①21日,左舜生代表青年党政致信蒋介石,也作了类似表示。中国共产党也一再表示拥护国民政府实行《抗战建国纲领》。4月27日,中共中央向长江局发出《中央关于国民党临全大会后的策略问题的指示》,指出《抗战建国纲领》虽有诸多不完善之处,但其基本精神与中共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是一致的。

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是在徐州会战已经开始,武汉保卫战行将发动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为了集中权力以适应战争形势,大会改变了国民党的领导体制,确立领袖制度,设立总裁,大会认为,“自总理逝世以后,党中领导失其中心”,^②力量无从发挥,因而设总裁为全党领袖,代行总理职权,在全国代表大会闭幕期间,由总裁行使党的最高权力。大会推蒋介石为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总裁制的设立使蒋介石得以合法独揽党政军大权,使他成为国民党内享有至高无上权力的领袖。与中央的领袖制度相呼应,国民党的各级地方组织也采取首长制,一改过去的委员制。

大会还决定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取消预备党员制度,目的是

^① 吴相湘:《民国百人传》第3册,第22页。

^② 《吴委员敬恒代表主席团说明推举总裁副总裁原词》,《革命文献》第76辑307页。

“训练全国青年,使人人信仰三民主义”。^① 1月9日,三民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蒋介石兼任团长。

根据大会通过的调整党政关系等各项决议案,国民党加强了对全党及全国的政治控制。在党政关系上,在中央一级实行以党统政,在省与特别市一级采取党政联席的形态,县级则融党于政,全国各行政系统、军事系统等都要设立国民党的党团组织。对于各种社会团体,国民党完全控制了自治、慈善、开垦等社会团体工作,并由党的专门机构统管农、工、商、医药、律师等职业团体的工作。

国民党确立领袖制度,强化对该党及整个社会的政治控制在某种程度上是迫于战时状态的需要,但它也隐伏着很大危害,即国民党及其领袖会利用这种在非常状态下得到的权力维护其既得利益,实行个人独裁的一党专制。

二、国民参政会的召开与全国各党派、各阶层抗日热忱的高涨

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为争取各阶层支持政府抗战,逐渐采取了一些顺应民心的政治措施。1937年7月31日,国民政府释放了沈钧儒等闻名中外的救国会七君子。八一三事变后,国民政府又在最高国防会议下设立了国防参议会,由蒋介石聘请在野党派的领导人及社会名流组成,该会具有团结各党派共同抗战的象征意义,是后来国民参政会的胚胎。9月,国共两党正式表示团结抗日,共赴国难。国民政府颁布了《修正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和《惩治汉奸条例》等。在政府的默许下,各在野党派已可以公开身份从事抗日救亡运动。

南京失守后,中国的政治、军事、交通中心已西移至武汉,各党

^①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第514页。

派均以武汉为中心开展政治活动。国民政府充分意识到武汉在战略、战略中的重要地位。蒋介石指出：“武汉居长江上游，为天下之中，无论我们要控制东南和华北敌人，规复已失的领土，或保持内部与西北的联络，巩固后方的安全，我们都必须保卫武汉，固守武汉。”^① 1938年3月25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要求动员全国武力、人力、财力、物力保卫武汉。围绕保卫武汉这一中心任务，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热忱迅速达到高潮。

1938年2月6日，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成立，陈诚任部长，周恩来（中共）、黄琪翔（第三党）担任副部长，并到部任职。4月1日，政治部设立第三厅，由郭沫若任厅长，厅中工作人员多为左翼著名文化人士，分别进行对国内、对日本和对国际的宣传，通过文字、歌咏、美术、戏剧、电影等各种宣传方式进行抗日动员。在抗战一周年之际，发起了武汉各界抗战建国周年纪念大会的献金运动，各界人士捐献金额达100万元。

国民党全国临时代表大会召开以后，在野党派取得了合法地位，民众运动进一步开放，武汉先后出现了200多个民众抗日团体，著名的有武汉青年救国团、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蚁社等，这些民众团体从事抗日宣传、募捐、慰问前线将士等活动，有的团体奔赴前线进行战地宣传和服务，武汉青年救国团数千人到豫东和第5战区参加游击战，武汉成了中国抗日民众运动的中心。

1938年4月12日，国民政府根据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公布了《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按照条例规定，国民参政会是一个咨询性质的机关，它对国民政府有咨询权和建议权。参政员人选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定，包括各省市地区的代表、华

^① 杨树标：《蒋介石传》，第359至第360页，团结出版社，1989年版。

侨代表、文化和经济团体代表,各党派人士则以各种团体的名义成为特任的参政员。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共有代表 200 人,其中国民党人有 88 人;共产党参政员计 7 人:毛泽东、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邓颖超、秦邦宪、陈绍禹;救国会 3 名参政员为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国社党 6 名:张君勱、罗隆基、胡石青、徐傅霖、陆鼎揆、梁实秋;青年党 7 人:曾琦、李璜、左舜生、陈启天、余家菊、常燕生、喻维华;第三党 1 名:章伯钧;中华职教社两名:黄炎培、胡厥文;乡村建设派 1 名:梁漱溟。其余均为无党人士。

7 月 6 日,第一届第一次国民参政会在汉口召开,汪精卫任议长,张伯苓任副议长,167 名参议员参加会议。中共参政员除毛泽东外其余均出席会议。在短短的 10 天会期内,参政会通过了 125 件决议案,陈绍禹等提出的《拥护国民政府实施抗战建国纲领案》,获得了全体参政员一致赞同。《抗战建国纲领》成为各党派所共同愿意遵守的政治纲领。参政会上通过的重要议案还有《拥护政府长期抗战国策案》、《切实保障人民权利案》等。

国民参政会召开之际正是日军准备西犯武汉之时,中共参政员毛泽东等在《我们对于国民参政会的意见》中即指出:“国民参政会首届会议开会之际,敌人的铁蹄已走进了中州原野,江淮河汉之间,也弥漫着敌人的炮火,皖赣两湖受着敌骑的威胁,武汉成为敌人急切窥觐的目标,因之,我们认为最急迫的问题莫过于如何保卫武汉。”^① 陈绍禹等在会议上提出《加强保卫大武汉案》,内容分为军事、政治、经济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主张。

国民参政会是抗战时期带有政治协商性质的咨询机构,也是各党派政治上合作的一种形式。第一届参政会的召开有力地显示了中国各党派在强敌压境下的不屈意志和坚强团结。参政员虽非

^① 《国民参政会纪要》(上册),第 77 页,重庆出版社 1985 年版。

第二编 全民族奋勇抗战——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沦陷

民选,但确实有广泛的代表性,从“建国”的意义上看,参政会的召开也是民主政治建设的良好开端。

不过,国民党在政治上的开放有其限度,而且主要是因为抗战严峻形势所迫,它仍企图继续垄断政治权力,蒋介石一度试图将共产党、青年党等消融于国民党之中,国民党临时全国大会也强调“各界人士,不问其派别如何,尤应捐除成见,在一个信仰、一个领袖、一个政府之下,实行抗战”。^①《扫荡报》等公然宣称“欲使国家趋于绝对统一之途,必须一党专政”、“如有反对一党专政者,即无异于反对统一,即无异于破坏抗日”、“在共同信仰三民主义之下,就不应该有‘国共合作’的名词”。对于国民党不能操纵控制的民众团体,则加以弹压,1938年2月,国民党下令解散了西安文化协会、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等13个社团。8月20日,武汉卫戍总司令部下令解散武汉青年救国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蚁社等抗日团体。

三、德国停止对华军事援助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就一再要求德国召回在华德籍军事顾问,停止对华军事援助,甚至不惜以退出日德防共协定相威胁。但德国不同于左袒日本的意大利。意大利和中国之间没有重要的通商关系,中日战争爆发后,它便讨好日本,1937年11月8日公然承认伪“满洲国”,并停止了与中国的军火交易及军事往来。德国在中国有重大贸易利益,从1931年到1937年间,德国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比例从占4%增加到占12%。1937年,德国已是中国对外贸易伙伴中的第3名,仅次于美国与日本。在德国对外出口的国家中,中国名列第12位,日本为第20位。在向德国输入货

^①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第448页

物的国家中,中国名列第21位,日本仅为第44位。^①据德国工业集团《1937年年鉴》所提供的数字,在所有接受德国军备物资的国家中,中国的数量占37%,居第一位。1937年德国向中国出口的战备物资价值为23 748 000马克,1937年则猛增至82 788 600马克。因而,德国对交战的中日双方一直表示它将严守中立,不为日本的要求所动。德国有两个托词,其一,若德国召回在华顾问,则苏联顾问必将取而代之,对德、日两国均不利;其二,德国的军事顾问已经不属于德国国防军成员,他们通过私人聘约直接对蒋介石负责,德国对此不承担责任。为了避免日本这个东方反共盟友在中国陷于无休无止的战争,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一度曾在中日之间斡旋,但因日本方面所提和谈条件过于苛刻而未能成功。

随着中日战局的发展,纳粹德国从其对苏战略考虑,日渐倾向日本,而日本驻德大使东乡则向德国人表示,“日本极愿在发展中国家经济上与德国合作。德国商人常恐德国在中国的商业受排挤,其实那是不会发生的”,^②消除德国商人的疑虑。1938年2月5日,日本外长广田弘毅约见德国驻日本大使狄克逊,要求德国承认“满洲国”,停止运送武器到中国等。2月20日,德国元首希特勒在德国国会发表演说,宣称“无论东亚在何时如何,德国本着防共立场将永远把日本视为和誉为安全的因素”,表示“已决定承认‘满洲国’,以抛弃过去不可解之幻想政策,而尊重现实”。^③2月24日,中国政府对德国表示抗议,但除此之外并无表示,只想委屈求全。驻德大使程天放则认为最好让德国用书面承认不召回顾问及

① 《中德关系史文丛》,第231页,中国建设出版社,1987年版。

② 《中德关系史文丛》,第238页。

③ 《战时外交(二)》,第679页。

对经济合作继续进行。“如能办到,则我方之委屈求全,始有意义”。^①

3月间,德国停止接受中国赴德受训的军事人员。4月27日,德国第二号人物戈林不顾中德易货四年协定,禁止向中国出售武器军火。同日,德国外交部正式通知中国大使馆,德国希望撤回在中国的德籍军事顾问。德方在外交文件上正式列出24名德国军官和9名其他人员的名单,要求他们迅速回国。由于中方对德国顾问再三挽留,6月21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与总顾问法肯豪森向中国外交部次长徐谟口头声明:“如于6月23日以前,中国国民政府对于全体德国顾问之即时离华不予明白表示同意,并担保该顾问等之离华,则本大使奉令立即将所有职务移交于代办,离华返国。”并进一步威胁道:“中德外交关系之是否继续维持,或由我方予以断绝,须视关于顾问问题之以后发展而定。”^②6月28日,陶德曼奉柏林之命经香港回国。同时,在华的德国顾问接到德国外交部的严厉训令,称撤退顾问是希特勒亲自下的紧急命令,对不按照德国政府要求行动的军官将采取严厉的措施,军官违令者会被取消德国国籍,没收全部财产。在此情形下,法肯豪森总顾问遂率全体顾问于7月5日离开中国。

德、意、日侵略同盟威胁着全世界的和平。作为一个侵略行为的受害者,中国与德、意关系的恶化是极为自然的。但当时国民党内有一股势力仍愿维持与德意的友好关系,他们的动机不尽相同,主要可分为3类。一种为法西斯主义的倾慕者,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是他们心目中的偶像;一种为不讲原则的现实主义者,他们奉行多交朋友而少结仇怨的主张;另一种则别有所图,想借德意之线与

① 《战时外交(二)》,第680页。

② 《战时外交(二)》,第688页。

日本妥协,汪精卫即属此类。他在首次国民参政会上公开支持李圣五提出的“加强德意外交案”,遭到中共参政员的激烈反对。关于中德关系恶化的影响,《大公报》在德国承认伪“满洲国”时便有精当的评说:“希特勒这种态度对于中国将有两种好的影响,在对暴日作殊死战时,而尚属望日本同盟者德国的援助,这本来是一种矛盾。现在矛盾解消,中国的国际政略当然走向反法西斯集团一条路。……从国际全局说,法西斯集团这样采积极的攻势,才可以促成反法西斯国家联合阵线之真正成功,大势上反而与中国有利。”^①

四、张鼓峰事件的影响

1938年6月中旬以后,日军大本营集中调集兵力准备攻占武汉,但在此期间却发生了一度令日军大本营深感不安的日苏间的武装冲突。

张鼓峰在中国东北瑗春县最南端,位于苏、中、朝边境,是图门江北边的一座山峰。苏联认为国境线应沿张鼓峰峰顶,而日本则将整个张鼓山山峰视为“满洲国”领土。瑗春县当时划入日本“朝鲜军”的防卫区域。

1938年7月13日,“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大将得知苏联红军已于11日占领张鼓峰,立即向日军大本营报告:“长池附近,历来苏方即以条约规定称为苏联领土。我方查阅苏联发行的地图,亦明显看出为满洲领土,当属有争议地区。苏方擅自采取上述处置,显系非法行为。然而鉴于该地在目前对我作战计划影响不大,加以正在进行中国事变,所以不拟立即采取反击措施。本军准备由现地直接据理要求其撤退。最后万一苏方不接受我方要求

① 《李尧文存》第2册,第50~54页,大公报馆1947年版。

第二编 全民族奋起抗战——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沦陷

时,则企图断然以实力将苏军驱逐至长池以东地区。”^① 7月16日,日军大本营向“朝鲜军”司令官下达如下命令:“对张鼓峰附近苏军非法越境,朝鲜军司令官根据需要,得以在朝鲜所属之部队向国境附近集中。但行使实力须听候命令。”^② “朝鲜军”司令官遂令第19师团师团长尾高龟藏派步兵4个大队,山兵2个大队、重炮兵1个大队向张鼓峰附近的四会、庆兴、阿吾一带集中。日军参谋本部作战科认为应给张鼓峰上的苏联军队一个重大打击,以使苏军不再发生类似事件。而集结于事发地带的第19师团则锐意备战,准备给苏军一击。

7月20日,日军参谋总长晋舘日本天皇时,表示要对张鼓峰的苏联红军行使武力,但天皇担忧万一引起真正的日苏战争,未予同意。

7月29日,苏联红军10余人至张鼓峰北方约2公里的沙草峰一带修筑工事,第19师团长未奉大本营命令便下令攻击苏军。下午4时,苏军增加兵力,并使用坦克夺回沙草峰。30日夜,第19师团以一个联队的兵力夜袭沙草峰、张鼓峰,加以占领。8月1日,苏军以优势的空军攻击日军第一线部队,轰炸朝鲜境内的交通设施。装备本来就差于苏军的第19师团陷入苏军优势火力的攻击中。对此,战地日军要求使用空军作战,但日军大本营鉴于中日战争正紧张进行,不敢轻易扩大冲突,直至冲突结束都未允许使用空军作战。8月2日,苏军在飞机、坦克和远程火炮的掩护下,进行大规模攻击,第19师团死伤惨重。但日军大本营连使用坦克作战都不允许,第19师团只得困守阵地不断挨打。8月6日,苏军出动两个师的兵力,使用百余辆坦克、100架飞机及炮兵对张鼓

① [日]井本熊男:《作战日记綴成的支那事变》,第254页。

② [日]井本熊男:《作战日记綴成的支那事变》,第255页。

峰、沙草峰的日军反复攻击,第19师团已支撑不住。日军在中国战场上虽骄横不可一世,但在装备更现代化的苏军面前,相形见绌,当时日本如引发对苏战争,弹药的保有量不足15个师团一次会战之用。8月5日,日军大本营被迫准备下令撤出张鼓峰、沙草峰一带,退至原驻地。但这一命令对日军意味着失败的屈辱,因而迟迟未能下达,第19师团遭受苏军连续数日打击后,已实力耗尽,无力支撑。恰在此时,日驻苏大使重光葵同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李维诺夫于10日午夜正式签订停战协定,日军第19师团才得以从容撤退,使日本勉强保住了面子。

张鼓峰事件中,日苏双方投入兵力将近10万,日军死伤1440人,苏军死伤847人。在这场实力较量中,苏军动用了大量坦克、重炮、飞机等现代化武器,日军的装备相形之下不免自惭形秽以致情愿看着第19师团挨打,也不敢出动飞机和坦克与苏军正面较量。最后不得不撤出沙草峰和张鼓峰。

张鼓峰事件爆发后,中国政府非常关切,1938年7月27日,蒋介石致电苏联大使杨杰,要其询问“张鼓峰案苏俄以后决心究竟如何?倭如提议组织划界或调查委员会时,苏俄是否接受?如其接受,则倭藉此拖延时日,且可于此会期内希图保障其安全,而抽其东北兵力侵华,待侵华告一段落,再以全力对苏,其意甚明,苏必勿受其愚,请以中意转问其当局决心如何”。^①从张鼓峰事件的影响看,它对日军进攻武汉一度起了牵制作用,但它没有发展成日苏全面战争又不免使许多中国人感到怅然。事实说明,苏联虽愿支持中国消耗日军力量,但不可能直接参加对日作战。日军通过在张鼓峰的冲突,深切感受到苏军的强大,但也觉察到苏联并无意扩大战争,因而继续进攻中国当时抗战的重心——武汉。

^① 《战时外交(二)》,第342页。

第二节 武汉会战

一、中国防卫武汉的战略部署

武汉为湖北省会,地处中原,水陆交通便利,素有“九省通衢”之称,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就水路而言,武汉三镇位于长江与汉水交汇处,长江从湖北境内蜿蜒东去可沟通皖、赣两省,而从宜昌溯江西上,则有巴蜀可作倚托的大后方。武汉还是铁路交通枢纽,凭借粤汉铁路和平汉铁路两大交通动脉贯通南北。武汉的工商业也较为繁盛,为华中地区第一大都会。

全面抗战开始后,由广州输入经粤汉铁路北运的各种重要战略物资经武汉中转集散,分头接济各战区。南京失陷后,国民政府宣告已迁都重庆,但优越的地理、交通条件和工商业基础使武汉成了战时中国事实上的军事、政治及文化中心。正因为如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南京失守后立即筹划以保卫武汉为中心的军事计划。

1937年12月13日,军事委员会军令部在武昌拟定了《军事委员会第三期作战计划》,决定:“国军以确保武汉核心、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为目的,应以各战区为外廊,发动广大游击战,同时新构筑强韧阵地于湘东、鄂西、皖西、豫西各山地,配置新锐兵力,待敌深入,在新阵地与之决战。”^① 1938年1月11日,陈诚受任为武汉卫戍总司令,负责筹备武汉防御事宜。

^① 《军事委员会第三期作战计划》(1937年12月13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从淞沪会战至南京失守,华东战场上的中国军队主力损耗严重,编制混乱,战力大减。当时武汉至南京间的封锁线及防御体系尚未完成,长江沿线倍感空虚。不过占据了上海、南京的华东日军并未以主力乘势沿江西进,而是选择了先北上津浦路,待华东、华北日军打通津浦路、会师徐州后再攻占武汉的战略。这使中方能较为从容地部署武汉保卫战。1938年初,军事委员会判断日军将由平汉线南下,并从大别山北麓及长江两岸西进会攻武汉,“则此时由湘赣之幕府山脉至豫鄂皖境内之大别山脉……预想也为将来之主战场也”。^① 鉴于南京保卫战的教训,军事委员会认为武汉三镇从地形上观察并不易守,因而“欲确保武汉而始终保持武汉为我政治经济资源之中枢,则应战于武汉之远方,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是上策”。^② 武汉卫戍总司令部乘徐州会战紧张进行之机,在武汉外围构筑防御工事,整理补充军队,加紧备战。

1938年5月19日,日军占领徐州,随后以3个师团兵力沿陇海路西进,准备以主力由豫东平原与皖北地区直压平汉线,席卷郑州、开封,南下信阳,与预备使用于长江方面的一个军会攻武汉。日军大本营于5月底已决定于秋季攻占武汉,并视攻占武汉、控制中原要地为压迫中国政府投降或崩溃的最大机会。当黄河决堤造成的大面积泛滥阻止了豫东日军的进攻势头,向开封、郑州方面西犯的日军主力由津浦路方面向合肥以北地区靠近,于6月初攻陷涡阳、凤台、寿县、正阳关等地,以与合肥方面的日军取得联络。日军大本营被迫改变作战路线,以主力沿长江两岸,一部沿大别山北麓西犯武汉,战略形势为之一变。武汉外围防御阵地由对北及东北正面变成单纯对东正面。中方因徐州会战及陇海路战斗失利——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647~648页。

②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647~648页。

度濒于危急的战略态势渐趋稳定,借此喘息之机,重新布防。第5战区部队已部署于长江北岸及大别山北麓地区。第1战区主力则从6月9日起纷纷奉调南下增援,6月14日成立了以陈诚为司令长官的第9战区。这样,在武汉外围,第5战区负责守御长江以北,第9战区则守御长江以南地区,不过,位于长江北岸的田家镇等江防要塞部队仍归第9战区指挥。至7月11日,军事委员会决定集中主力于武汉外围,“利用鄱阳湖与大别山地障,并藉长江南岸之丘陵与湖泊施行战略持久”,计划在武汉外围与日军作战4个月,以求最大限度地消耗日军有生力量。^①至此,军事委员会防卫武汉的作战总体构想已经完成,即武汉三镇为策动全国抗战的中心,其得失为国内外所瞩目,绝不能轻易放弃。鉴于武汉核心区域(包括平汉路南段和粤汉路北段)自身不易防守,因而战争主要应在武汉外围地区进行,配置有力一部在九江以东地区迟滞日军推进的速度,会战的主阵地则选择在湘鄂赣边境和鄂豫皖边界的丘陵、湖泊地区,湘鄂间边境有幕阜山、庐山、九宫山鄱阳湖之险,鄂豫皖边则依大别山脉作天然屏障。军事委员会意识到武汉保卫战“固不能保我土地之不失,亦不妄冀歼灭敌人”,^②作战的主要意图是尽可能消耗日军力量,以利长期抗战。

二、长江沿岸的前哨战

1938年6月上旬至8月初是武汉会战的前哨战时期,日军一面派兵占领前进阵地,一面从各地集结主力准备总攻。

安庆、马当、湖口、九江均为江防要地,占领后日军便能将它们

① 蒋纬国:《蒋委员长如何战胜日本》,第50页,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

② 《军事委员会第三期作战计划》(1937年12月13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作为沿江进窥武汉的军事及补给基地。

1938年6月1日,华中派遣军命令第6师团坂井支队以步兵两个联队、山炮兵一个联队的兵力自合肥南下,以拊安徽省会安庆之背。6月以后,坂井支队因阴雨不停,道路复遭中方严重破坏,前进极感困难。不过,位于合肥西北部的徐源泉第26集团军未能阻止坂井支队前进,该路日军所造成的战略压迫形势,已令担负安庆及巢湖方面的第27集团军杨森部守军难以安枕。与此同时,日军还专门调来波田支队,充当溯江作战的先锋。波田支队原驻防台湾,适应亚热带气候作战,并且受过严格的登陆作战训练,由波田重一少将任支队长,下辖步兵两个联队,山炮兵一个联队。11日夜,波田支队在日海军20多艘舰艇输送下驶抵安庆附近江面。翌日凌晨,波田支队2000多人冒着大雨偷袭登陆,向安庆进攻,迅速占据了城郊的飞机场,杨森部第20军第146师及保安队“未经力战,轻弃名城”,^①致使安庆于12日陷落。攻陷桐城的坂井支队得知波田支队已占安庆后,改道西南,向大别山防线的前沿阵地潜山县进发。第5战区为阻止日军西进,以杨森部第27集团军防守太湖、望江之线,以徐源泉第26集团军占领潜山以西山地,以韦云淞部第31军集结太湖附近,策应徐源泉部侧击沿潜山、太湖西进的日军,激战至18日,中国军队才放弃潜山。徐源泉部和杨森部虽有集团军的番号,实际上都只有1个军两个师的兵力,且装备素质欠佳,尤其是徐源泉部的“士兵乱放空枪,纪律废弛,敌来即退”,“自官亭撤退未放一枪,沿途拉夫扰民无所不至”,^②以致轻

① 《徐永昌致第27集团军驻鄂办事处主任电》(1938年6月15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军令部代电》(1938年6月15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第二编 全民族奋勇抗战——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沦陷

失安庆。徐、杨两集团军也未完成上级指示的“最小限度固守潜山、石牌，以系马当封锁线之安全”的命令，^①连失要地，迅速导致南京到武汉间江防第一道屏障——马当封锁线危急。

马当处皖、赣之交，位于江西省彭泽县境内，距彭泽县城30公里，是重要的江防要塞。在马当江面，中国方面为阻止日舰西犯，设人工暗礁30处，沉船39艘，布雷1600多具，^②同时毁除荻港上游至九江一线的航标。马当要塞司令王锡焄辖有马当要塞守备第1、第2营，炮兵教导第1、第2队，主要由水兵和原海军陆战队员编组而成，受第16军军长李韞珩统一指挥。当日军进窥马当之际，李韞珩仍调集各部队官长2/3至该军的抗日学校受训，对于实际战备，过于疏忽。

6月24日，日舰8艘输送陆战队800多人在东流登陆，守军第53师及第167师与日军激战后丢失了马当东面的香山、黄山、香口诸要地，日军乘胜攻向马当，马当如此重地，当时仅配置有守兵一营，加上从东方溃退下来的第53师官兵，计500多人，而每日在日军炮火中阵亡的就达百余人，急待援军解救。江防总司令刘兴和李韞珩迭电第167师师长薛蔚英率部增援马当，该师迟迟不至。26日上午，守军因连日死守，牺牲殆尽，马当要塞终告易手。27日，李韞珩奉武汉卫戍司令罗卓英之命率第16、第53、第167师反攻马当。28日克复香山等地。在马当要塞防卫战中，第167师师长薛蔚英以耽误战机获罪，被查办枪决。

日军占领马当要塞后，即分兵向彭泽县东郊的磨盘山等地进攻，29日晨进入彭泽县城，湖口、九江一带顿时告紧。30日，第9

① 《徐永昌致第27集团军驻鄂办事处主任电》（1938年6月15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中国现代历次重要战役之研究——抗日战役述评》，第251页。

战区令第43军军长郭汝栋为湖口守备军司令官,第26师赴湖口,接替彭位仁第77师防务。7月3日,日军已用汽艇从彭泽运兵至湖口登陆。前来湖口接防的第26师尚在渡河,先头部队即与日军交火,该师官兵来自四川,系由保安队临时编成,“完全新兵,武器又劣,重机枪全无,轻机枪仅及半数”,^①但在师长刘雨卿率领下仍奋力厮杀,在湖口市区进行白刃巷战,血战昼夜。至7月4日夜,第26师所剩人数不到1/3,湖口亦告不守。第18军奉令反攻湖口不能成功。不过日本海军因中国空军活跃,在长江中的军事行动尚有所顾忌,且铜陵、荻港、香口一线,中方对长江日军保持侧击姿态,日军行动受到牵制。

23日零时,波田支队冒雨乘艇进抵姑塘,预备第11师竭力抵抗,击沉日军汽艇10余艘,激战3小时后,日军登陆成功。第2兵团总司令张发奎得到报告,令第15、第128师增援,务于拂晓前歼敌。可第128师支援不力,反自溃败,退往九江、星子。24日,波田支队与第106师团会攻九江,翌日晨发起总攻,驻守九江的李玉堂第8军处境窘迫,第4军欧震部虽匆匆赶至,但张发奎为防止不测事态,未将第4军投入使用。25日夜,日军蜂拥进入九江城,双方激烈巷战。26日晚,九江遂告弃守。同日,九江对岸的江防要地小池口也已丢失,长江南岸的中国军队退守星子、牛头山、金官桥、十里山一线。

九江、湖口不仅为长江之要冲,也是进入江西和湖北两省的门户。九江一带中方集结有大军数十万却败不旋踵,以致日军已进抵中国军队的主阵地。形成这种不利局面的原因主要有3个,一是由于军事当局固守九江的决心下得过于仓促,以致后勤准备不

^① 《刘兴致陈诚电》(1938年7月7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第二编 全民族奋勇抗战——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沦陷

周,“前线部队白昼困于飞机轰炸,一面作工,一面运米,九江附近部队近十万,仅恃九江、马回岭小径为后方联络线,因之粮弹之补给、伤员之运送均无法实施,士兵枵腹应战,伤兵呻吟于道左,作战精神顿形颓丧”。^① 二是高级将领缺乏自信心,中下级军官大多无力掌握部下,故每遇日机袭击“多数溃散,甚有未见敌人,溃不成军者”。^② 三是败于军纪不良,负责九江之役的张发奎自陈:“职由阳新徒步经瑞昌至九江时,满目荒凉,殆绝人烟,民众既失同情之心,军队自无敌忤之气。”^③

7月4日,日军大本营下达华中派遣军战斗序列,以畑俊六任司令官,下辖2个军及1个直辖兵团,担负长江下游占领区域之守备及攻略武汉之任务。负责攻略武汉的日军为第2军及第11军,第2军司令官为东久迩宫稔彦王,下辖第3、第10、第13、第16共4个师团及1个步兵旅团,约有10万之众,向合肥、舒城一带集中。第11军司令官为冈村宁次中将,下辖第6、第9、第27、第101、第106师团及波田旅团,约有125000人,以主力向九江,一部向黄梅集中。第3舰队和航空兵团支援第2、第11军作战,拥有战斗机、轰炸机近300架,兵舰100多艘。华中派遣军直辖兵团为第116师团和两个重炮旅团,守备湖口以东地区,并充作总预备队。但日军为进攻武汉须从各地抽调兵力,北抵晋绥,南达余杭,还有的部队远在日本国内,输送集结成为一大难题。日军“在炎烈的气候下不断经历着非语言所能表达的痛苦,如铁道船舶的

-
- ① 张发奎:《九江失利原因报告书》(1938年8月7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 ② 张发奎:《九江失利原因报告书》(1938年8月7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 ③ 张发奎:《九江失利原因报告书》(1938年8月7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长途输送,在恶劣道路上行军,耗费时日的渡河,补给严重不足,霍乱、疟疾流行等,以致野战病院中就充满了患者,并有不少人死亡”。^① 日军集中如此缓慢,加上中途发生张鼓峰事件,迟至8月下旬才集结完毕,全线向武汉方向包围推进,准备采外线包围态势,分5路合围武汉。在长江南岸,一路沿南浔线南进,进击南昌。一路沿瑞武路西进,迂回武昌之南。在长江北岸则兵分3路,一路在长江沿岸作战,直接攻击武汉,一路则由大别山北麓进攻信阳,迂回汉口之北,另一路则要突破大别山,进至黄陂一线。第2军负责大别山北麓作战,第11军则担负江南及沿江作战,成为主攻部队。

7月中旬,军事委员会判明日军进攻路线后,将第9战区主力编成第1、第2兵团,将第5战区主力编成第3、第4兵团,分头迎战来犯日军。第1兵团总司令薛岳率25个师任南浔线及其两侧地区的防务,取外线之势侧击西进日军,屏障南昌。第2兵团司令张发奎率33个师担负瑞昌至武昌间长江南岸的正面防御之责。第3兵团总司令孙连仲率8个师任大别山北麓及正面防御。第4兵团总司令李品仙率13个师在长江南岸及大别山南麓之间地区布防。这样,中国保卫武汉的防卫线以长江北岸的大别山与南岸的幕阜山、庐山为基干,以信阳、罗山、潢川、固始、商城、霍山、六安、宿松、黄梅、广济、瑞昌、德安、阳新等地为据点,构成一绵亘千余里的弧形防线,该防线所在区域山湖交错、易守难攻,日军机械化武器装备的运用开始遭遇到重大困难。

三、黄梅、广济方面的作战

日军占领安庆潜山后,打开了沿江北岸西进的通道,在日军中

^① [日]井本熊男:《作战日记编成的支那事变》,第233页,(日)芙蓉出版社出版。

第二编 全民族奋勇抗战——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沦陷

向有精锐之称的第6师团稻叶四郎部从大别山南麓及长江北岸间的长条地段大举西犯,该路线距离武汉最近,并可在日军海空军的直接掩护下作战,不过第6师团必须通过的潜山、太湖、黄梅、广济一带地区丘陵起伏,湖沼错杂,为天然的守势地区。

早在6月22日,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就判断日军攻打武汉只能循溯江西上一途,建议军事委员会“应充分采用内线作战原则,迅速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先于太湖、宿松、英山、广济间狭隘地带将溯江西进之敌,聚而歼之,然后转移兵力,各个击破”。^①他反对处处设防,逐次使用兵力的倾向,认为这样正面防守力量既不雄厚,侧面打击力量又嫌薄弱,不仅失去歼敌战机,反而会被日军各个击破。显然,李宗仁试图集中兵力重创孤军突进的第6师团,重演一次台儿庄大捷。但到24日,第5战区得到日军4路攻打第5战区防地的确切情报,日军将“一由蒙城进攻阜阳,趋新蔡、汝南,南犯确山;二由正阳关犯霍丘,趋固始、光山,南犯信阳;三由合肥犯六安,越叶家集、商城;四由安庆犯潜山,趋黄梅、广济”。^②面对日军来路甚多,第5战区免不了分头抵御,而当时,中国军队主力大部集中第9战区,第5战区兵力远不及徐州会战后期雄厚,缺乏围歼第6师团的充分实力。黄梅、广济作战开始前,李宗仁因病离职,由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代行司令长官职权。

长江北岸至大别山南麓守军以广西部队为骨干,另外还有川军、西北军等。计有廖磊部第48军、张淦部第7军、覃连芳部第84军、韦云淞部第31军、许绍宗部第29集团军(辖第44、第67

① 《李宗仁致蒋介石电》(1938年6月22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李宗仁致蒋介石电》(1938年9月18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军)、刘汝明第 68 军以及杨森、徐源泉部,各部均由第 4 兵团司令李品仙统一指挥。李品仙令杨森、徐源泉在潜山、太湖一带迟滞日军。6 月 26 日,日军占领太湖城,此后即以主力移至江南支援九江、湖口方面的战斗。徐、杨两部与第 1 军协同侧击日军,经 3 天剧烈搏杀后,将日军逐往潜山东北和望江东南一带。李品仙得以指挥所部顺利地控制了潜山、太湖、宿松、黄梅一线的西北方山麓,以第 68 军守备宿松、黄梅正面及沿江要点,将第 84 军控置于广济方面。

7 月 25 日,日舰 28 艘炮击小池口等 68 军第 118 师阵地,日海军陆战队在 70 余架飞机掩护下强行登陆 4 次,均被击退,阵地附近村落被炮火炸成一片废墟。26 日,日军第 3 师团猛攻如常,守军伤亡甚重,小池口告失。8 月 2 日,日军第 6 师一部由太湖进攻宿松,与第 3 师北进的两联队人马汇合,近迫黄梅城。黄梅、广济方面战事顿呈激烈状态。刘汝明部在黄梅城郊与日军剧战后于 4 日退出黄梅城。黄梅、广济为鄂东门户,北岸战事为之紧张。

8 月 3 日,第 5 战区代司令长官白崇禧前往第 4 兵团指挥部召集师以上将领开会,决定反攻黄梅,同时加紧侧击太湖、潜山等日军据点,限 8 月 6 日行动。各部遵命而行。第 68 军和第 84 军固守黄梅西北一线阵地,第 31、第 7、第 10 军及许绍宗集团军一部从黄梅东北及太湖、潜山西北山地侧击日军,第 4 兵团其余主力则立即向广济一带集中。

日军第 6 师团北受中国山地部队钳制,西南为长江及湖沼所限,渐入困境,主力徘徊于宿松、黄梅之间一筹莫展达月余之久。在中国军队不断反攻下,第 6 师团后方补给线时有被切断之虞,且为对付中国军队持续的猛烈攻势不得不集中力量,收缩战线,日军遂放弃以前经太湖、宿松等地的陆上补给线,而改由小池口方面,由长江水路获得补给。8 月 26 日,中国军队乘势克复潜山、太湖,

日军向东南撤退。

8月23日,日军第11军命令第6师团进攻广济、田家镇两个要地。第6师团准备派牛岛支队和今村支队向广济方面攻击前进。28、29两日,第68军和第84军猛攻黄梅附近日军,激战两昼夜,一度逼近黄梅城。日军据险死守,并于30日以主力进行反突击,反复争夺阵地,第68军、第84军因久战不支,被迫于30日晚向广济及其西北高地转移。第6师团尾随穷追,9月6日,突破了田家寨、笔架山阵地。李品仙因总预备队使用殆尽,只能抽出两个团增援,无力挽回败局。当晚,守军各部奉命退出广济。8日,第31军发动反攻,一度克复广济,9日晨,日军增援反扑,又夺回广济。李品仙兵团反复围攻广济,直至月底。该兵团因连日恶战,损失异常惨重,在阵地上尚保持相当战斗力,继续“勉强应战者惟第7军及48军各两师”。^①

广济失守严重影响到田家镇要塞的安全。田家镇要塞乃武汉锁钥之地,江面狭窄,附近湖泊密布,形成要塞的天然屏障,是长江要塞中最坚固、最大的堡垒。富池口要塞、半壁山炮台与田家镇要塞夹江对峙,共扼长江航路。它们的北岸有黄梅、广济,南岸有瑞昌、阳新,均为重兵把守的主阵地,掩护着它们的侧背。蒋介石即指出田家镇、富池口两要塞“为大别山及赣北我主阵地之锁钥,乃五、九战区会战之枢轴,亦武汉最后之屏障”。因而日海军虽横行长江之中,但当其陆军未能突破田、富两要塞侧背的陆上阵地时,却也奈何不得这道坚固的封锁线。广济一失,田家镇要塞侧背受敌,9月16日武穴又告失守,日军从北、东北、东南三个方向扑向田家镇。15日起,第6师团今村支队从广济南下,迂回攻击田家

① 《李品仙致蒋介石电》(1938年9月18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镇。17日,为作战便利起见,军事委员会将原属第9战区指挥的田家镇要塞守军第2军李延年部归第5战区指挥。第5战区即令萧之楚第26军、张义纯第48军、何知重第86军等协同李延年部夹攻南下日军,今村支队反遭包围,伤亡甚重,士气低落,第6师团不得不再分兵增援今村支队。28日,由武穴西进的日海军数千人乘要塞守军两师北上阻击今村支队南下之机,侵至要塞核心,飞机78架与炮百余门协同步兵围攻。留守要塞的第2军第57师施中诚部决死抵抗,直至李延年下达撤退命令才弃守阵地。日军在死伤千余人后,方于29日晚控制了田家镇要塞。李品仙兵团以主力固守广济西北山地,一部担任上巴河和蕲春间江防。而第6师团占领广济、田家镇后,已是元气大伤,华中派遣军从第116师团抽出志摩支队增援第6师团,并给第6师团补充3000名兵员。补充期间,第6师团已无力扩大战果,李品仙兵团方面的战事一时陷于沉寂。

四、大别山麓阻击战

当李品仙兵团在黄梅、广济一线与日军第6师团等胶着之际,华中派遣军第2军于8月22日开始从合肥等地大举西犯,一路企图沿大别山北麓直冲信阳,沿平汉线南下武汉,一路则准备突破大别山,进犯鄂东黄陂一带地区,策应第6师团等部作战,从东北地区进窥武汉,完成对武汉的战略包围。

六安、霍山位于大别山东麓,当鄂豫皖三省要冲,日军欲沿大别山麓西犯,必先侵占六安、霍山。故此,第5战区第3兵团总司令孙连仲奉命率部进驻商城,迎战来犯日军。孙兵团下辖第77军冯治安部、第51军于学忠部、第71军宋希濂部、第30军田镇南部、第42军冯安邦部等,计13个师,1个独立旅,战斗员约10万人。面对日军第2军4个师团,孙兵团显得兵力单薄,但当时第5

第二编 全民族奋勇抗战——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沦陷

战区长官部显然更关注第6师团的动向。8月25日,代司令长官白崇禧虽注意到了日军将沿大别山北麓西进的种种迹象,还是判断日军“北岸主力仍在黄广方面,……六安、商城迂回过远,霍山则地险粮缺,六霍方面不过支线作战而已”,^①况且黄、广方面战事方酣,第5战区兵力不敷分配,只能调原驻扎在信阳一带休整的第59军张自忠部前往潢川一带布防,第17军团胡宗南部则在信阳、罗山布防,呼应孙连仲兵团作战。

8月23日,日军先头部队200余人出现在六安城东十里铺一带,遭到第51军牟中珩师的抗击而退往金官。27日,第10、第13师团主力由合肥出发,准备首先占领六安、霍山,然后控制潢川、商城一线。28日,日军发动全面攻势,攻击的第10师团第一线兵力增至3000人,激战一昼夜后,第51军退出六安城,撤至河以西阵地。29日,第13师团已占领霍山。其后,第10师团向固始、潢川方向进攻,第13师团则指向叶家集、商城方面。

大别山北麓的公路东自六安、合肥,西达潢川、信阳,其间富金山至峡口段最为险要。第5战区欲在此阻敌西犯,将精锐的宋希濂部第71军3个师配置于峡口以东,叶家集以西地区,并以富金山这一天然堡垒为主阵地。同时,将擅长防守的孙连仲第2集团军第30军田镇南部两个师配置在侧翼协助第71军防守。

9月2日,第13师团渡过史河,占领了叶家集,直逼石门口、富金山一线,宋希濂指挥第88师由富金山北侧向东出击,协助正面防御的第36师反击,稳定了阵地。5日拂晓,日军猛攻富金山、石门口主阵地,6日午后,富金山三面受敌,第三峰一度被日军占领,第36师师长陈瑞珂亲率预备队猛烈反击,才将日军击退,双方

^① 《白崇禧致蒋介石电》(1938年8月25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在半山腰对峙。日军第2军见战事停滞,急调第16师团和10师团一部增援。至11日,日军援兵大至,守军战况渐形不利,富金山800高地主阵地受到围攻,拂晓时,第36师与第51师阵地的结合部被日军突破,第36师师长率余部作最后的反攻,但此时该师仅剩800余人,已是力不从心,黄昏时分丢失了富金山最高峰。9月16日,第16师团等占领了商城。

日军第13、第16师团以两个师团之众,在富金山被阻10天,死伤数千人,尸体皆“运叶家集焚化,臭闻十余里”。^①第13师团有的步兵中队中剩下40多人,大队长、联队副官以下等级的军官伤亡甚重。守军第71军官兵也于此役中阵亡2618名,受伤12401名。

当第13师团受阻于富金山时,第10师团北犯固始,从寿县、凤台一带抽调的3000日军由正阳关溯淮西上,与第10师团遥相呼应。防守固始的中国第71军一个团节节抵抗,但因骑兵旅增援未及,9月6日丢失了固始,日军主力得以沿固始—潢川公路西犯潢川,遇到张自忠第59军的全力抵抗。日军进展缓慢,推进至潢川城下时,便以密集炮火攻城,并大放毒瓦斯,全城毒气弥漫如烟。但第59军将士“自军团长以次,莫不身先锋镝,抱必死之决心,巷战肉搏,迭行逆袭”,“倭尸累积、濠水尽赤,我虽伤亡亦重,然率达成守至23日(18日)之任务,良足矜式,该部师长刘振三中毒两次,犹不稍却,尤堪嘉尚”。^②18日,潢川始陷。20日,光山也落入日军之手。

① 《李品仙致蒋介石电》(1938年9月13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蒋介石致孙连仲兵团诸将领电》(1938年9月22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第二编 全民族奋勇抗战——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沦陷

日军第2军进抵商城、光山一线后,继续兵分两路,北路第10、第3师团从光山、潢川继续西进,向罗山、信阳攻击,试图遮断平汉路,南下武汉。南路日军为第13、第16师团,由商城转而南下,攻击沙窝、小界岭,力求突破大别山正面防御阵地,走捷径出武汉东北方,协同在长江北岸进展困难的第11军第6师团作战。

9月16日商城失守后,第16师团即有南下之势,第5战区司令长官部顾虑到大别山核心根据地的安全,令田镇南第42军、冯治安第77军等部在商城以西以南山地占领阵地,在沙窝、新店一线遏止日军南下。27日起,第16师团会同第13师团先后沿商城、麻城间公路南下。孙连仲第2集团军在打船店等线节节抵抗,宋希濂部第71军原应调至后方整补,但因前线兵力单薄,战况紧急,只得裹创再战,在小界岭等处层层设防。孙、宋两部密切协同,利用山岳险要地形,长期顶住了日军频繁的进攻,使其两个师团兵力局促于崇山峻岭间动弹不得。日军在200多公里的行程中受阻月余之久,伤亡惨重,日方自己承认已陷入苦战,死伤达4500人。中国守军也付出了重大牺牲。10月10日,第71军3个师仅余4个团,而第30军除工兵、通讯兵外,战斗员不及3000,其中第30师只剩下160多。13日,徐源泉部奉命接替第30军的防线,但仍难支撑下去。战至20日,阵地已处处空虚,时时有被日军突破之虞。22日和24日,第13、第16师团先后突破田镇南、宋希濂、徐源泉等军阵地,通过小界岭,进入湖北省境,25日、26日,分别占领了宋埠、麻城等地。而此时,武汉已经失陷了。第13、第16师团的动作显得非常迟缓。正如宋希濂日后所言,防守沙窝、小界岭一带是“保卫武汉整个战局的重要关键,因为日军如突破小界岭防线,越过整个山脉,便可沿着公路西进,占领花园,直逼武汉”,^①

^① 《武汉会战》,第248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

从而影响整个战局。

北路方面日军,第10师团由潢川、光川一线西犯罗山,9月17日与胡宗南第1军在潢、罗之间的竹竿铺交战,遇到守军坚决抵抗,伤亡较大。20日,第10师团主力冲过竹竿铺,乘势攻占罗山,一部更深入罗山、信阳间的五里店,受到配备有重炮、坦克等重型武器的胡宗南第17军团的强有力反击,胡部从西、北、南三面猛攻日军数日,致使日军死伤数千人,退回罗山待援。10月2日,第3师团主力推进至罗山,协助第10师团攻击信阳,并企图歼灭胡宗南部。11日,迂回到信阳南的第10师团主力遭到胡宗南部和孙连仲部的夹击,死伤2000余人。第10师团由于沿途受到重创,每个中队已不及30人。12日晚,胡宗南未经第5战区司令长官部批准,擅自放弃信阳,平汉线被切断。

信阳为平汉路重镇,北部为河南大平原,南方则是丘陵起伏的地带,距其南方42公里处有著名的三关险要,武胜关居中,东侧的九里关和西侧的平靖关与它互为犄角。桐柏山绵延于关隘之西,大别山横亘于三关以东,只有平汉铁路两侧为平坦通道。日第2军为乘势消灭第5战区主力,令第3师团一部确保信阳附近,而第10师团等主力昼夜兼行,向武汉西北方的应山、安陆、花园等地突进,企图与第6、第13、第16师团合围平汉路以东的第5战区部队。24日占领了应山,26日又占领了安南。平汉线方面的中国防线因胡宗南全军擅自放弃信阳,并退往信阳西北,造成正面空虚,全线为之震动。因为日军如迅速从应山、安陆南下,则所有在东北一线作战的第5战区部队均将处于日军包围圈中。第5战区司令长官部当即命令各部队迅速向汉水以西地区撤退。罗卓英的武汉卫戍部队与刘汝明的第68军等部则在三关一线与日军反复争夺,依据有利地形,迟滞日军南下,掩护平汉路东部队撤退。直至10月28日,日军才完全控制了平靖关和武胜关,完成了包围圈,给尚

残留在路东的第5战区部队西撤造成混乱和损失。但日军因兵力不足,网眼过大,路东的中国军队仍能分散退往平汉路西的桐柏山和大洪山等地。

五、南浔路大战

九江及新鄱阳西岸的西、南地区为通往武汉及南昌的门户与主要通道,也是第9战区屯积重兵的主阵地。7月25日,第9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断定日军占领九江后,“当以舰队溯江西犯,其陆军则以主力向瑞昌,趋武昌,以有力之一部,最少当在一师团以上经德安趋南昌”。^①他意识到第9战区部署上的弱点,即虽在九江附近已集了20多个师,“但均注意于沿江沿湖之守备,处处薄弱,敌仍可随时随地强行登陆,又因防广无法控置机动部队,对情况变化每感应付之困难”,^②电请蒋介石是否能集中兵力给日军一次打击。次日,蒋介石即表示“决在德安瑞昌一带与敌决战”。^③8月5日,第9战区拟定会战计划,决定以一部配置沿江各要点及南浔路,尤须固守田家镇要塞,以主力控置于德安、瑞昌以西及南昌附近地区,侧击深入之敌,并在任何情况下争取处于外线地位,确保机动自由,至万不得已时,以卫戍部队固守武汉,而将主力转移于武汉外围地带夹击敌人而聚歼之。^④第1兵团薛岳部担任南浔路

① 《陈诚致蒋介石电》(1938年7月25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陈诚致蒋介石电》(1938年7月25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③ 《蒋介石致陈诚电》(1938年7月26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④ 《第9战区作战计划》(1938年8月5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正面(九江—南昌)屏障南昌,侧击西进日军。第2兵团张发奎部负九江、瑞昌一带防御作战之责,保卫武汉,并掩护南浔正面的西侧翼。

日军占领九江后,主力暂时移至江北,南浔路上的日军为第10、第106师团,由后备役编成,战力稍弱于其它日军师团。7月27日,第106师团由南浔路正面南下,猛扑狮子山、张家山阵地,来势颇为凶猛。

8月1日,第1兵团总司令薛岳受命全权指挥南浔路作战,率第70军李觉部、第8军李玉堂部、第4军欧震部、第66军叶肇部、第29军陈安宝部、第74军俞济时部、第64军李汉魂部、第26军王敬久部、第32军商震部、第18军黄维等部迎战来犯日军。第1兵团的防守区域恰似一个等腰三角形,顶点是九江,底边是修水河。九江弃守后,金官桥庐山北麓一线接近顶点,是最短的防御线,愈向后退,正面愈广大,就越不易防守。

8月6日,第106师团首挫于处于南浔正面的金官桥阵地,联队长田中圣道被第70军将士击毙。8日,第106师团再受挫于第8军赵锡田师,阵亡两名大队长,第145联队损失过半。在金官桥等坚固阵地前,第106师团屡遭挫败,一筹莫展。8月中旬,整个师团的中小队长伤亡近半数,战斗力和士气大为低落。日第11军司令部因从南浔路正面强攻不下,乃调第101师团从东侧助攻,企图由星子方面,沿德安—星子公路直趋德安,迂回中国军队右侧,切断南浔路。

8月19、20两日,第101师团在鄱阳湖西岸的星子登陆,与中国第25军第53师冷欣部激战,试图侧击德安、隘口,截断南浔路正面中国守军的后方联络线。冷欣部奋勇迎战,终因独力难支,连失星子、玉筋山,23日退保庐山东侧的东、西孤岭,这两处险要钳制着德星公路。第66军叶肇部在隘口、黄塘铺之线布防,并协助

第25军挡住了日军攻势。

南浔阵地的西侧翼开始出现漏洞。24日,瑞昌方面的日军第9师团丸山支队向第30集团军王陵基部守卫的岷山阵地突然发起攻击。王部战力甚弱,连失鲤鱼山、笔架山、新塘铺等要地,制高点全陷敌手。9月1日晚,第74军第58师急赴马回岭以西阻敌向南浔线突破,未能成功。薛岳深感西侧背威胁太大,令第51师、第58师和第90师夹击丸山支队。第9战区长官部也调第18军黄维部沿瑞昌—武宁公路紧急向西增援,协同消灭该路日军。但第58师未能顶住日军攻势。9月3日午,丸山支队进入马回岭。不久该支队调至瑞昌方面,第106师团接守马回岭。马回岭失守使南浔正面大军不得不忍痛放弃坚守月余的阵地,退至德安以北的阵地,重新稳定了战线。

与此同时,沿德安、星子公路向西南突进的第101师团在攻占玉筋山后,直趋章恕桥,与牛屎墩日军遥相呼应,钳击东孤岭。9月5日深夜,日军终于攻陷东孤岭,不过伤亡十分惨重,第101联队长饭塚国五郎大佐毙命。

东孤岭为南浔右翼阵地的依托点,也是西孤山的屏障,日军占领东孤岭后,处于居高临下的位置,造成西孤岭和隘口方面中国守军作战困难。但防守西孤岭的第190师苦战8天,击退了日军20多次猛攻,顶住了日军进行的6次毒气袭击,直至侧面的烂泥塘、鸡笼山均告失守,预备队全部用尽,陷入三面被围的险恶形势下死守不退。迟至12日晚,日军才掌握了西孤岭。隘口告急,第29军军长陈安宝指挥第79师与40师负责守御,战至27日,第101师团师团长伊东中炮负伤,日军锐气大挫,攻势陷于停顿。

第11军司令部对南浔路方面迟迟无进展甚为焦虑,策动了一次大迂回行动。9月20日,令第106师团除留一部警戒马回岭一带外,以主力突破五台岭,“迅速进入德安西南地区,从侧背攻击德

安周围之敌”，^①以求转变战况。第106师团奉命行动，官兵只携带了6天食粮，悄然而进。9月29日，已进抵万家岭，受到中国第9战区所属第4军和第85军、第91军的東西夹击，后方补给线也被截断。由于第106师团冒险突进至南浔路和瑞武路中国军队主力之间，薛岳决定先以全力消灭这股心腹之患，遂从瑞武、德呈、南浔3个战线抽调第4军、第74军、第66军、第64军、第32军、第72军等合围第106师团。10月6日晚，援军纷纷赶至，开始攻击。第66军克石头岭，第74军猛攻长岭、张古山，争夺至为酷烈，互相近距离投掷手榴弹，继之以白刃战。双方都死伤累累，无法取得决定性进展。10月8日，日第11军司令部发现第106师团已陷入绝境，慌忙派飞机空运弹药粮秣救济第106师团，并狂轰滥炸中国军队阵地。在箬溪附近的第27师团也奉命派铃木支队向东南急进，救援第106师团，第1兵团只得抽出围攻部队，阻击日军援军。隘口方面的第101师团为牵制中国军队，自10月7日起，不顾一切地向第29军阵地发动攻击，守军因激战经月，大量减员，9日放弃了隘口。由于蒋介石急切希望薛岳部能在10月10日前解决万家岭被围日军，9日，薛岳下令各师选派敢死队数百名合力攻击，当晚将万家岭、雷鸣鼓等地占领，残余日军凭借田步苏、箭炉苏据点工事死守待援。该夜，叶肇、欧震两部就缴获轻重机枪50多挺、步枪1000多支，俘虏日军30余人。在万家岭的包围战斗中，薛岳兵团毙敌3000，伤敌更众。不过，薛岳也意识到“此次敌迂回作战之企图虽遭挫折，但我集中围攻，未将该敌悉数歼灭，至为痛惜

①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第175页。

第二编 全民族奋勇抗战——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沦陷

……对我有利时期已过,各部苦战,伤亡过重,战力几无”,^① 在继续围攻残存日军的同时,各部于12日后奉薛岳之命转入防守态势。铃木支队逼退了甘木关一带的中国守军,与第106师团残部合流,使该师团免遭全军覆没的命运。

攻陷隘口后的第101师团会同南浔路正面第106师团一部南犯,第27师团则由西北向德安压迫,德安位置顿形突出。10月27日下午,日军冲进德安城,与第139师守城部队发生巷战,28日,日军完全控制德安。为避免与日军背水作战,薛岳下令所部退至修水南岸,与日军隔河对峙。

南浔线上的战斗是中国军队利用庐山等山区险要地势抗击日军的杰作,也是日本军部在武汉会战期间最感到不安的一条战线。从星子至德安仅30多公里,从8月21日日军陷星子后,整整花费两个多月时间才占领德安。日军每占一座山头都花费极大的代价,结果该方面日军不仅未能达到占领南昌的预定目标,第106师团在万家岭地区还差点全军覆没,直到武汉失守两天后,南浔路日军才推进至德安,此后沿修水与中国军队对峙长达半年之久。

六、瑞昌及其以西地区作战

瑞昌及其以西地区由第2兵团负责防守,兵团司令张发奎下辖第30集团军王陵基部4个师,第3集团军孙桐萱部3个师、第31集团军汤恩伯部7个师和第32军团关麟征部4个师,主要负责防御日军西犯武汉。向瑞昌及其以西地区西犯日军为第9、第27师团及波田旅团等,试图迂回武汉以南,切断粤汉路。

8月8日,日军开始在瑞昌附近江面扫雷,11日,波田旅团第

^① 《薛岳致蒋介石电》(1938年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 联队在港口登陆,占领了望夫山、平顶山。奉命防守瑞昌附近地区的是从山东转战而来的第 3 集团军。该集团军总司令孙桐萱责令第 22 师第 64 旅及师直属部队全力反攻,一时又将日军压缩回港口。12 日下午日军再兴攻势,丁家山、马鞍山等失陷,第 22 师退守蜈蚣山一线,此时,第 52 军关麟征部第 2 师已推进至瑞昌西北的大脑山、笔架山、拱山岩地区,协助孙桐萱部作战,但仍未能遏止日军的攻势。15 日,日军登陆大树下,守军退至朱庄。22 日,第 9 师团主力增援,会同第 106 师团一部及波田旅团全力西攻,孙部抵挡不住,于 24 日下午放弃了瑞昌城。至此,第 3 集团军已伤亡严重,而且该部官兵大都来自北方,“队伍初到长江附近,水土不服,官兵患病者近三千五百员……患病减耗战斗员甚于战场之伤亡”,^①因而调至后方整补。24 日,日军丸山支队由瑞昌南下,轻易突破了第 30 集团军在岷山一带的防线,突向马回岭,致使南浔线上的中国军队感到侧背受敌。27 日,关麟征第 52 军主力进至瑞昌西北,阻止日军西进,31 日晨,关军乘日军立足未稳,向瑞昌西部的大郊山反攻,歼灭日军千余人。瑞昌以西山地连绵,利于防守,加上丸山支队南下协助南浔方面作战,瑞昌方面的日军攻势顿挫。9 月 7 日,丸山支队从马回岭调回瑞昌,11 日,会同第 9 师团的西北沿江进犯,主力企图突破瑞昌西部山区,分别指向阳新、武宁,一部则沿长江南岸西进,攻占码头镇、富池口等长江要塞,以协助日本海军排除长江中的阻塞工程。交战双方在瑞昌—马头镇、瑞昌—武宁、瑞昌—阳新这 3 条战线上同时激战。

在长江南岸,日军波田旅团于 14 日占领了马头镇,16 日开始攻击富池口要塞。第 18 师将士凭借险要地形与要塞坚固工事,与

^① 《蒋介石致军政部长何应钦电》(1938 年 9 月 1 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第二编 全民族奋勇抗战——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沦陷

日军血战一周,战至23日,第18师师长李芳郴丧失战意,不顾张发奎令其坚守的命令和下级军官的劝阻,丢下部队,星夜弃职潜逃,富池口要塞遂于24日失陷。10月4日,日军以兵舰20多艘、飞机70多架,联合田家镇、富池口两要塞的火炮轰击半壁山,继以700多士兵登陆强攻,第193师守兵两营除10多人生还,其余均战死。自田家镇、富池口要塞失陷后,江面封锁力量不足,道士袱以下江岸边,重炮运动不便。日本军舰可毫无顾忌地长驱深入,海军陆战队在各处随意登陆,使守军难以防范,会战已临最后阶段。17日,日军猛炸石灰窑,廿丽初第6军伤亡奇重而退,18、19日,阳新、黄石港先后落入日军之手。波田旅团、高品支队等日军因在江岸平地进攻,且能得到日海军的火力支持,进展较速,相形之下,在瑞昌—阳新及瑞昌—武宁的日军因在山地作战,进展非常迟缓。

9月11日拂晓,第9师团开始攻击瑞昌以西汤恩伯集团军防守的山岳阵地,其左翼部队于夜间攻克了仙女池高地,而右翼部队则因汤恩伯集团军在瑞昌西北的和尚脑及太阳寨顽强抵抗未有进展,13日始占领太阳寨。中国军队利用险要地形,逐次抵抗。22日,第9师团进入木石港东南地区,向排市、辛潭铺方向推进,汤恩伯部退至富水河南岸继续阻敌前进,并不时发动逆袭。10月8日,第9师团渡过富水河,向三溪口前进,遭到周福成第53军的抗击,攻势陷于停顿。在波田旅团的支援下,第9师团于17日突破三溪口以东地区,翌日攻占了阳新。

第27师团于9月16日开始沿瑞昌—武宁大道发起攻击,占领了横港等地。25日,得到第106师团佐枝旅团增援的第27师团开始攻击大屋田村西南方高地及白水街附近,威胁武宁、德安。第14兵团司令薛岳抽调预6师、第60师等6个师兵力占领乌纱岭、白水街、麒麟峰等阵地,薛岳亲至白搓督战。同日,麒麟峰发生激战,预6师吉章简部顶住了日军攻势,并在第60师陈沛部的协

同下重创日军铃木联队,守军伤亡团长杨家骝等官兵 700 多人。27 日,日军占领了麒麟峰,但仍被限制在扬访街以北、西崇山以东、昆仑山以北地区,未能进展。至 10 月 1 日,第 27 师团进占天桥河附近,5 日占领箬溪。然后留下佐枝旅团,主力西进,向辛潭铺方面进犯。但因万家岭第 106 师团告急,第 27 师团因忙于分兵援救,延缓了西进速度,至 18 日始渡过富水占领辛潭铺。

日军占领阳新、辛潭铺后,波田旅团向大冶、葛城、武昌方面进发,第 9、第 27 师团主力则准备切断粤汉路。

七、武汉弃守

10 月中旬,长江南北日军均已逼近武汉,会战已届尾声。

军事委员会鉴于困守南京的惨痛教训,自始即无以主力死守武汉三镇的打算,试图根据武汉外围战的情况决定撤离武汉的日程。根据陈诚的回忆,“武汉撤退时机最初决定 8 月底,后改为九一八,又改为 9 月底、双十节,直至 10 月 20 日领袖尚在武汉”。^①撤离武汉计划的多次变更,既表明蒋介石的战略决策缺乏坚定性与连贯性,也说明日军向武汉缓慢推进的速度出乎中方意料。9 月 29 日田家镇要塞失守后,军事委员会放弃了以罗卓英的武汉卫戍部队死守武汉三镇的计划,10 月中旬开始部署撤退事宜,武汉的民众已开始疏散,政府机关及重要工业设施等迁往湖南、四川等地。21 日,广州的沦陷更使军事委员会决定尽快结束会战。24 日,中国守军全线总撤退,第 9 战区的主力向湘北和鄂西转移,第 5 战区的主力向平汉路以西的汉水沿岸及大洪山区。整个武汉只留下一个旅作象征性的抵抗。

^① 《陈诚关于日寇侵略武汉的回忆资料》,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第二编 全民族奋勇抗战——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沦陷

长江南岸日军为迅速占领武汉,以波田旅团、高品支队等部向武昌方面速进,张发奎兵团则竭力阻击,以求在10月底之前确保金牛、通山、鄂城之线,以便大军从容南撤。20日,波田旅团控制了已被日军飞机炸成一片焦土的大冶,22日占据了鄂城,24日起攻击距离武昌西南30公里处的葛城。同时,日军第9、第27师团则力求切断粤汉路,以准备围歼第9战区主力,但遭到配置在金牛以东太平塘亘梁子湖一线中国军队的阻击,至26日始占领金牛,其后,第9师团经金牛至贺胜桥,第27师团则经金牛向贺胜桥、咸宁之间前进,目标均为切断粤汉路。

长江北岸,第10、第3师团已于10月12日占领信阳,切断了平汉路,至24日已进至汉口西北的应山等地。翻越大别山的第13、第16师团则于24日通过小界岭,进入湖北省境。日第11军为与第2军取得协调,催促在广济附近休整的第6师团向汉口方面攻击,10月17日,补充尚未完毕的第6师团勉强向西攻击,但因当时中方已决定放弃武汉,该师团的攻击便异常的顺利,22日占领了上巴河,24日晚已攻占汉口以北约30公里处的黄陂。

10月25日,第6师团突破汉口市郊戴家山守军阵地,于夜间率先闯入汉口市内。次日晨波田旅团攻陷武昌。27日,高品支队进入汉阳,至此,武汉三镇均已被日军踏于铁蹄之下。

日军占领武汉后,以主力追击围堵全面撤退中的第5、第9战区军队。在鄂南地区,10月27日,第9师团进入贺胜桥地区,切断了粤汉线。同日,第27师团在咸宁东北的仙桃镇截断粤汉路。29日占领咸宁。30日,第11军下令第27师团“应经沿咸宁、汀泗桥地区向崇阳以南地方继续进行追击,第9师团应沿粤汉线地区向岳州追击”。^① 日军11月3日占领嘉鱼,6日占领崇阳,9日攻

^①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第196页。

占通城,11日夜间攻占了岳阳。第9战区部队经历了数月的长期战斗,已是疲惫不堪,士气不振,只得且战且退。幸好日军因兵力有限无法继续扩大战果,最后双方遂在岳阳、通城以南新墙河南岸亘修水一线形成对峙局面。在鄂北地区,日军10月24日占领应山后,28日又占领安陆,控制了河口镇—花园—安陆公路的西端。30日,日军占领应城,11月4日,又占领了皂市,控制了中国第5战区军队向西撤退的战略要点,但日军封锁线的网眼过大,第5战区除留下第21集团军廖磊部在大别山区游击外,其余各部都先后陆续退至平汉路西,并沿信阳、应城、安陆、云梦、花园、孝感、皂市之线与武汉日军对峙。从武汉撤守的全过程看,中国军队撤退尚是有计划的,但撤退的时间略有迟缓,以致在撤离中秩序相形紊乱,造成一定损失。

武汉会战从安庆失守算起到武汉失守为止时间长达4个半月。论地,它不像淞沪会战局促于长江三角洲一隅之地,而以广阔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淮河流域为战场,包括江西、安徽、河南、湖北4省。论兵力,日军投入12个师团,前后补充数次,人数达40万之众。当武汉会战告终时,日本投入中国内地的师团多达26个半,国内只留下1个近卫师团,还准备必要时来华作战。^①而中国相继投入会战的部队有120多个师,伤亡达25万人,这是中国近现代军事史上第一次在如此广阔的地域上,调度如此庞大的军事力量协同作战。它是抗战初期国共关系融洽、全国各阶层一心一意支持武汉保卫战的结果。

在武汉会战中,中国军队处于内线作战,而日军处于外线作战,当然这种内线外线之界限是变化的。日军在训练、装备、火力及海空军方面均占有巨大优势,中国军队的优势主要在兵员数量

^① [日]角田顺等编:《现代史资料9·日本战争(二)》,第366页,美铃书房出版。

第二编 全民族奋勇抗战——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沦陷

方面。但日军实行征兵制,补充迅速,而中国军队一旦损失,暂时便无法恢复战斗力。军事委员会决定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四郊,将主战场置于武汉外围,即豫鄂皖边区和湘鄂赣边区,利用崇山峻岭、起伏的丘陵及湖泊为天然屏障以弥补自己不足,与优势日军周旋,战略指导基本正确,从而能在富金山、大别山、万家岭、金官桥、田家镇等处重创日军,获得良好战果。武汉会战中,日军未能歼灭一个中国完整的师,但它的第106师团却几乎要在万家岭全军覆没。毋庸置疑,武汉的丢失标志着中国军队已在武汉会战中失败,从会战的结果看,中国的损失相当严重,兵员伤亡为日本数倍,大量武器装备被毁坏,丢失了平汉、粤汉这两条最重要的交通线,交通运输枢纽被日军掌握,富庶的长江中下游地区被日军占领破坏。但从整个抗日战争的进程来看,武汉会战则是抗日战争的一大转折点,1938年10月31日,蒋介石在《为放弃武汉告全国同胞书》中指出:“我国抗战之根据,本不在沿江沿海狭交通之地带,乃在广大深长之内地……盖抗战军事胜负之关键,不在武汉一地之得失,而在保持我抗战持久之力量。”^① 武汉保卫战严重消耗了日军力量,在这场大会战中,日军死伤近10万人,加上病患者计达15万人,随着战火蔓延到武汉一带,日军兵力已不敷分配,战略进攻势头大大减弱,从而抗日战争迎来了战略相持阶段。

^① 《党史概要》第3册,第1292~1293页。

第三节 闽粤作战

一、日军侵夺厦门及闽粤沿海岛屿

闽粤海岸线绵延约 3 000 公里,握有绝对制海、制空权的日军利用台湾、澎湖列岛为基地,可在中国沿海各地随意择要登陆,使中国在这漫长崎岖的海岸线上防不胜防。但就整个战局而言,除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战略位置相当重要外,这一带地区陆上交通甚为不便,难以运用机械化大兵团作战,而且与中原要地相隔遥远,战略影响甚微。抗战前,国民政府军事当局估计日军只会在广州、厦门、汕头、福州等重要城市进行登陆作战,其主要意图有二:一是截断中国海上补给线,使中国难以获得国际援助而窒息灭亡;二是分散和牵制中国兵力,配合主力在华北、华东和华中作战。^①

全面抗战开始后,1937 年 8 月 24 日,日海军第 3 舰队司令部宣布封锁上海至汕头以南的中国沿海,出动海军航空兵轰炸漳州、福州、广州等城市,屠杀毫无防御能力的无辜平民。

闽粤两省属第 4 战区,由参谋总长何应钦兼任战区司令长官。1938 年 3 月,广西的梧州、南宁、龙州之线以南地区也划归第 4 战区,以便统筹海疆防务。

福建省与台湾、澎湖列岛隔海相望,日本得陇又望蜀,早想染指福建,而厦门正是侵闽的桥头堡。厦门日侨于 1937 年 8 月中旬

^① 国民政府参谋本部制:《民国二十六年年度作战计划》(甲案),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第二编 全民族奋勇抗战——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沦陷

撤退,日本领事也下旗回国。10月26日,日军侵占金门县,得到了进攻厦门的跳板。福建省主席陈仪急调驻厦门的粤军第157师收复金门,该师师长黄涛表示此事须征得第4战区副司令长官余汉谋同意。陈仪遂求助于蒋介石。28日,蒋介石电令余汉谋速派第157师收复金门。跨海作战风险很大,粤军对此事并不热心,收复金门一事也就不了了之。1938年1月中旬,第57师宋天才部接替粤军在厦门的防务。

1938年5月10日凌晨,日机18架配合第14舰队舰艇12艘对厦门之何厝等地反复轰炸,中国防御工事被摧毁殆尽。日陆战队2000余人登陆,由海军少将大野一郎指挥,何厝、江头等相继失守。第57师增兵反攻,毙敌百余人。午后,日军增兵千余人,并以飞机、舰炮轰击守军阵地。第57师伤亡甚重,第一线部队的军官就已损失了2/3。11日,中方从漳州调来两营增援,将敌逐至江头。日军又向白石炮台、胡里山猛攻,第57师副师长韩文瑛力战负伤。陈仪见“侵厦之敌陆海空军协同围攻我57师,韩旅及地方团警伤之奇重,厦门情势难挽回”,要第57师宋天才“密令该地军警于不得已时乘夜撤退,并将各炮台、炮及水电设备务予破坏”。^①11日,日军推进至中山路、大同路、厦门港一带市区,与守军激烈巷战。12日,守军撤至厦门岛北部,市区沦陷。日机狂轰东南著名学府厦门大学,整个校园被炸成一片废墟。守军乘着夜幕全部退出厦门。

广州沦陷之前,日海军在闽粤沿海已占领了厦门、福州口外的马祖岛,厦门附近大小金门、汕头外的南澳岛、东沙群岛及其它岛

^① 《陈诚致蒋介石、何应钦转陈仪电》(1938年5月11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屿。^①这不仅实现了封锁中国东南沿海的企图,同时也为日后南进埋下了伏笔。

二、日军登陆大亚湾,粤军轻失广州城

广州在上海失守后成为中国对外联络的最重要港口。它临近英属香港。广州湾是法国租借的水域。日本顾忌英法,在此作战不能不有所克制。

早在1937年12月,日本就准备攻克广州,舰只已齐集福建沿海一带。因日本空军炸沉英美在长江中游弋的军舰各一艘,引起英美两国政府的强烈反应。日本海军担忧此种情形下再在英美殖民地的大门口作战会引起事端,临时中断了登陆计划。已箭在弦上的日军竟悻悻然罢兵而去。中国仍能由广州从国外源源输进生活用品和战争物资,粤汉线成为一根重要的输血管,这条铁路从抗战发生到广州沦陷计运兵200余万,物资54万吨。^②

1938年5月底,日军大本营决定攻占武汉,并计划同时占领广州。因考虑到运输器材不足和避免分散兵力,决定等攻占武汉后再进攻广州,切断中国最重要的海上补给线。当时中国军队军火补给80%通过广州北运。但日本华中派遣军在武汉会战中遇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进展迟缓。因而,为切断粤汉路,瓦解武汉方面中国守军的士气,进行广州作战对日军便变得非常迫切。恰恰在1938年9月,英法在慕尼黑会议上出卖了捷克,对纳粹德国一味退让。日本军方看透了英国的色厉内荏,乃于9月7日作出了攻占广州的决定。

日军忙于备战,可国民政府军事当局并不相信日本会冒干犯

① 曹聚仁、舒宗侨编著:《中国抗战画史》,第198页,联合画报社印行,1947年版。

②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第295页,综合月刊社出版,1974年版。

第二编 全民族奋勇抗战——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沦陷

英国脸面之险与军事战略上分兵之嫌而在广东另辟战场。1938年9月7日,广东省长吴铁城向重庆密报日军在攻打武汉的同时,“拟同时进犯华南,其登陆地带似将在大鹏湾,现敌已派前驻瑞士公使矢田到香港等备南侵计划,并派舰在该湾海面追毁我渔船,以防其行动为我察觉”。^①10月8日,日军行动在即,吴铁城急电告重庆:“据香港英军情报机关消息,敌拟派四师团一混成旅团大举南犯,或在真(11日)日前后发动”,指出日军虽可能侵犯汕头,但主要战场仍在大鹏、虎门一带。^②蒋介石及军令部对吴铁城提供的情报颇不以为然。10月6日,军令部坚持认为:“敌最近将来决无攻华南企图,万勿听信谣言”,^③9日,军令部接到吴铁城的重要情报后,竟将此当成日军的反宣传。10日,蒋介石还认为广州方面不会发生大的战事,在粤军主力已半数抽调北上的情况下,仍恳请余汉谋“勉抽精兵一师以保全大局”,增援武汉。^④

中国负责广东防务的是第4战区第12集团军,余汉谋任第4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12集团军总司令,下辖张达第62军、张瑞贵第63军、李振球第65军及第83军,另有两个独立旅及虎门要塞部队。日军登陆前夕,广东方面戒备松懈,兵力分散,其中部署在澳头、淡水、惠阳,博罗一线的兵力仅为3个步兵团,在增城配置有一个师,这一部署是蒋介石亲自确定的,他判断日军若在广东登陆

① 《吴铁城致蒋介石电》(1938年9月7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吴铁城致蒋介石电》(1938年10月8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③ 《军令部对吴铁城电报的批示》(1938年10月19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④ 《蒋介石致余汉谋电》(1938年10月10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目标仅限于切断广九铁路和攻占虎门要塞。

10月9日下午,日海军第5舰队护送运载步兵的巨大船群悄然向大亚湾进发。12日凌晨2时,日军先头部队开始登陆时,守军第151师莫希德部仍未觉察。结果,日军在海滩附近集结时,几乎未受到任何抵抗。

登陆广东的日军为古庄干郎中将指挥下的第21军(波集团),下辖第5、第8、第104师团和第4飞行团,12日登陆的是第18、第104师团。第5师团正在青岛集结,待运南下。

登陆澳头的日军向淡水前进,淡水守军一团仅抵抗了两个小时,便于晚间弃城而逃。第18师星夜向惠州追击,14日上午已进至惠阳南部。惠阳前临大亚湾,背靠东江,广九路由此西达广州,为广州东面的重要门户。14日黄昏。日军开始攻城,防守该城的第151师何联芳旅恐惧日机轰炸,稍事抵抗后,就在晚间退出该城。日军马不停蹄指向博罗,第151师补充团团长林君勳率部先遁。16日,日军轻取博罗,17日、18两日,以主力15000多人向增城疾进。

10月13日,余汉谋接到蒋介石电令,内称:“敌已在大鹏湾登陆,我军应先积极集中兵力,对于深圳方面尤应严格布防,料敌必在深圳与大鹏二湾之间断绝我广九铁路之交通,此为其唯一目的。”^①及至惠阳失陷,余汉谋侦悉日军兵力有4万多人,其势头必得广州而后已。他下令各部向广州附近集结,委任第65军军长李振球为前敌总指挥,率部增防东江。17日,第53师在福田一线击溃日军一联队,迫使日军退往博罗,中国军队也退到增城布防。

第8师团在福田受挫后,一面加强对增城方面的攻击,同时派

^① 《蒋介石致余汉谋电》(1938年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第二编 全民族奋勇抗战——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沦陷

一部从龙门、正果出从化,向广州作大迂回行动。余汉谋派独立第20旅陈勉吾部向正果前进,掩护增城左翼。17日下午,陈旅在正果击溃了日军少数侦察部队,但陈勉吾向余汉谋汇报时却大大夸张了战绩。19日夜,余汉谋接获陈勉吾的电报后,信心大增,认定福田、正果两次作战已是中方转败为胜的关键。20日早晨,余汉谋率幕僚乘夜潜伏增城指挥,作了攻击性的部署,准备以第186师固守增城正面,调集粤军所有的战车约一营及新近从湖南调来的一团重炮兵支援该师作战。独立第20旅从左翼,第153师、第154师从右翼出击合围日军,乘拂晓前日军准备进攻之际,抢先发动攻势,将日军聚歼于增、博公路间浮罗山下。

20日早晨,日军飞机、大炮以猛烈的轰击将守军炮兵摧毁殆尽,战车也无法开动。处于第二线位置上的第154师尚未及按计划展开,第186师已在日军猛攻下向后溃退。独立第20旅的阵地也被日军中间突破,全线陷于混乱状态。

日军以主力进击从化、花县,以图截断广州至韶关间的联络,增城方面日军则准备由增广公路直扑广州。20日晚,余汉谋召集军事会议,决定在增广公路两侧布防。21日凌晨2点,经蒋介石许可,余汉谋将主力撤至粤北的翁源、英德线既设阵地。由于临时变更计划,仓猝行事。撤退时混乱不堪。21日下午,日军轻装甲车部队已闯进广州城,广州陷落。23日,第5师团占领另一战略要点——虎门要塞。

日本第21军以广州为中心,配置于三水、佛山、石龙一线。余汉谋第12集团军则在清远、横石、良口圩迄新丰之线与日军对峙。陈耀枢等两旅留在惠阳、淡水、虎门、宝庆等地区游击。武汉会战接近尾声时,在长江南岸的粤军精锐驰援故里,正面反击日军。11月14日克复从化,12月9、10两日克复惠阳、博罗等地。日军第21军深感兵力不敷分配,遂放弃大亚湾方面的补给联络线,收缩

兵力以确保广州及四郊,改以珠江水道为补给线,转取守势姿态。

广州是华南最大的工商城市,处于粤汉铁路和广九铁路的交汇点上,北通武汉,南连香港,控制着重要的国际交通线。广东是中国富庶之区,且为国民革命的发源地。1926年北伐军就是以广东为基地,取道湖南北上消灭北洋军阀的。广东民众的爱国情感素来深厚,粤军也以勇敢善战著称,在一·二八淞沪抗战、八一三淞沪会战及南浔线上作战均有良好表现。但在保卫广州战斗中,粤军却一败再败,轻失名城。粤军精锐半数抽调北上当然是一大因素,但主要原因在于中方误以为日军会顾忌英美在华南的利益,暂时不敢在广东大动干戈,结果麻痹轻敌,疏于防范,致为日军所乘。广东地方军政当局政出多门,事权不一,高级军官腐化颓唐更使局势无可挽回。

三、海南岛及潮州、汕头失守

海南岛位于广东西南,是面积仅次于台湾的中国第二大岛。岛上的海口、榆林等处可辟为海空军基地,日本海军长期觊觎海南岛,以便作为南进的战略基地,从而时时可以威慑香港、越南及东南亚的新加坡等地,具有重大战略价值。不过,军事委员会鉴于中国海军力量微弱,无法防卫海南岛,故仅令王毅率保安第5旅防守,王毅下辖第11、第15保安团1600多人,自卫总团7个中队1700多人及壮丁常备队7个大约300人,以主力守卫海口、秀英炮台及天尾港等地。

1939年1月19日,日军大本营“为建立对华南进行航空作战及封锁作战的基地”,下达攻占海南岛的命令,^①由海军第5舰队

^①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2分册,第101页。

第二编 全民族奋勇抗战——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沦陷

护送第 21 军所属台湾旅团及海军陆战队进行登陆作战。

2 月 10 日拂晓,第 5 舰队兵舰 13 艘抵达海口附近,轰击天尾港及秀英炮台。台湾旅团大部在书场码头、灯塔间登陆,同时一部在天尾港登陆,两部合击海口。保安第 11 团稍作抵抗后,于午后放弃海口、府城,向龙塘、十字路、安仁一线撤退。12 日以后,日本海军陆战队又在新兴市、榆林、崖县、博鳌等港口登陆。保字第 5 旅在十字路至安仁的防线,因新兴市等处日军登陆,后路有被截断之虞,被迫向江南岸转移。至 23 日,日军相继占领石桥、东山、文昌、安定等地。4 月初,日军向大路市阵地进攻,保安第 5 旅经短时间休整后,遂进行顽强抵抗,旋因受由博鳌港、那英港登陆日军的侧翼威胁,于 4 月 14 日起,分别向万泉河南岸加积、岭口、东昌以南撤退。5 月 7 日,岭口、东昌沦陷,日军控制了海南岛的各处重要地区,修筑飞机场及防御堡垒,中国的游击部队则对占领军不断进行袭扰。

日军攻占海南岛,加强了对中国东南沿海的封锁,获得了南进的战略基地。3 月 31 日,日本方面宣布南沙群岛划归日本,将其势力向南推进 1 000 公里,对香港构成包围态势,且可随时使用海陆空三军袭击越南。国际间对日本侵占海南岛的行动反应强烈,在日军登陆海南岛的翌日,蒋介石对外籍记者发表谈话,指出日军占领海南岛对于中国抗战并无多大影响,因为中日战争的胜败,取决于大陆上军事行动,一岛之占领与否,根本无关紧要。但他同时指出,日本占领海南岛行动等于是太平洋上的九一八事变,太平洋上的形势将为之突然改变。2 月 13、14 日,法国和英国驻日大使分别走访日本外相,询问日军行动意图,并就英法在华利益向日本外务省提出交涉。

1939 年 6 月,日军又在潮州、汕头采取军事占领行动。

潮州、汕头平原是广东仅次于珠江三角洲的平原,南洋华侨有

许多人的祖籍即在潮、汕地区,每年侨胞汇来大笔款项,支援了国内抗战。广州失守后,在华南地区仅次于广州的汕头港,成为与外国联系的重要港口,由汕头经潮州至韶关公路运送了大量军用物资。日军大本营为完成对华南沿海的封锁,并获得对华侨进行策动的据点,于1939年6月6日下令攻占汕头、潮州一带。准备登陆的日军为第21军第104师团的第132旅团,由旅团长后藤十郎指挥。

第4战区在潮、汕地区未配备强有力的野战军加以守备,防守潮、汕地区的仅有潮州保安团、汕头保安团以及独立第9旅华振中部。

6月21日,日第5舰队运送第132旅团进入汕头海面,2时,一部在濠岛东岸登陆,占领富昌附近地区,主力一部在新津港登陆,其余主力则溯西溪而上,在浮州登陆,各部于晚间分别进抵汕头外围,汕头保安团进行抵抗后于22日拂晓放弃汕头。25日,日军向潮州攻击,受到独立第9旅的抵御。27日,日军击退独立第9旅,占领了潮州。第4战区派独立第20旅增援潮、汕,7月14日发动反攻,一度冲入潮州城,不久退守揭阳、普宁一线与日军对峙。

第四节 中国海空军的浴血抗战

一、长江沿线的节节抵抗

中国军队撤离淞沪地区后,上海、无锡、常州等地相继沦陷,日军从陆路向中国海军要塞江阴进逼,江阴要塞处于孤立。1937年12月1日,中国海军奉命从江阴撤离。日军海军为配合日军陆路西攻武汉,则在突破江阴封锁线后,将部分舰艇开入长江,以第11

第二编 全民族奋勇抗战——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沦陷

战队、第1、第11水雷队等部组成扬子江部队实施西上进击武汉的计划。

与此同时,为打破日军企图,并配合国民政府军事当局武汉会战计划,破坏长江中下游航运,1937年12月南京失陷后,中国海军在位于长江通往江西、湖北的要冲马当要塞即开始布置新防线。中国海军以水雷作为主要封锁手段,在马当布雷800余枚,并为加强江防力量,“在田家镇、葛店各附近江面,依沉船、布雷等方法施以阻塞,而以要塞炮火掩护之;其未施阻塞区域,另配置漂雷队或游动炮兵,随时要以袭击敌舰”。^①海军投入了40多艘舰艇参加武汉会战,在鄱阳以东迎战日军,阻击日军溯江向九江集中,并在长江沿线各要点节节抵抗。海军总司令陈绍宽先后以“咸宁”、“永绥”、“江犀”等舰为旗舰,往来于马当、汉口、岳阳、长沙等地指挥。

1938年3月27日起,日军开始向马当进攻。日军舰队因被封锁线阻碍,无法西犯,便派3架飞机向防守封锁线的“义胜”炮艇攻击,炮艇望台中弹起火,官兵抢救了5小时。炮艇前段除弹药舱保存下来,其余均被焚毁。副艇长马世炳及1名信号员负伤。4月,日舰开始在大通、贵池活动,窥探马当要塞。中国海军派出游击队在香口、羊山矶等地施放定雷、漂雷,14日,炸沉敌舰两艘,沿江防务得到暂时缓和。6月21日,日军舰艇40余艘开始向马当炮台迫近。次日,10多艘满载日军的汽艇,在军舰的掩护下,向中国守军炮台发起进攻。各炮台官兵沉着应战,当敌迫近时,突发子母弹,击沉日军汽艇3艘。24日,日军出动9架飞机向巡防的“咸宁”炮艇狂轰滥炸,中国官兵阵亡3名,伤16名。^②中日海军在此相持不下。

^① 《陈诚私人回忆资料》(1935~1944年)(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海军抗战纪事》,载《民国档案》1986年第1期,第57页。

26日,日军海军陆战队从香口登陆,迂回进攻马当要塞,对中国海军炮台实行陆海军立体夹击,形成包围态势。该日晨,中国海军江防守备队第2总队与敌激战,日军伤亡200多人。日军恼羞成怒,悍然对中国守军施放毒气。争夺要塞的战斗十分激烈,南岸香山阵地先后4次失而复得。要塞海军炮兵和护守的海军陆战队同敌浴血奋战,大批官兵壮烈殉国。26日,日军从陆上攻陷马当。

马当激战之时,中国海军加紧在湖口组织第二道阻塞线,布置水雷区。6月21日,中国海军派舰艇布雷,先后投入了1200多枚,水雷线路密集,使日舰无法进犯,只得改由陆军担任前锋。7月4日,湖口要塞被日机炸毁后陷落。为防止日海军经由鄱阳湖深入江西腹地,中国海军派出炮艇数艘并改装数艘商船担任湖防,在湖内布放了一批水雷,并多次截击进犯鄱阳湖的日军舰艇,将其击退,阻止了日军沿鄱阳湖向南昌进攻。

湖口陷落后,中国海军随即又在田家镇加紧组织第三道防线。田家镇、葛店位于武汉以东,是拱卫武汉的长江要冲。海军以田家镇为保卫武汉的前卫,以葛店为后防线,在田家镇它山、象山编组田一台、田二台,装炮8尊,以彭瀛为队长,全队共197人,在此构成了第三道防御线。同时,中国海军为“保卫我长江南北两岸作战之联络起见,随将田家镇半壁山间、蕲春岚头矶间、黄石港石灰窑间、黄冈鄂城间均划作主要雷区。各区附近,先后布雷,计共布下1500余具”。^①并派出数股布雷别动队潜至日舰前方布设漂雷,击沉日舰2艘。

8月22日起,日军向田家镇要塞发起进攻。中国海军在陆军协同下,同日军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激战。8月,日军的攻势未能得手,日军遂改变顺江西进计划,转而进攻广济,邀击田家镇之背,切

^① 《海军抗战纪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载《民国档案》1986年第1期,第60页。

断田蕲交通。9月7日,广济失陷,日军主力由广济西南推进,在武穴方面会合后,向田家镇进犯;同时以飞机、舰炮连日向马头镇轰击,掩护扫雷。15日,马头镇失陷,长江南岸遂陷入困境,武穴一带陆上难以控制。于是,日军开始大量扫雷,江防顿时吃紧,田家镇江面形势告急。

18日,两艘日舰逼近晒山,被中国要塞炮兵击中左右两舷后带伤撤退。20日,日军加强攻势,利用雨雾迷朦之际,由6艘军舰掩护,11艘汽艇向炮台发起登陆进攻,企图通过田家镇。中国海军炮队以炮火予以压制,日军又派出4艘炮舰和驱逐舰增援,双方展开猛烈的炮战。中国海军击沉8艘日军舰艇。22日,日军再派汽艇进攻,中国海军以子母弹炮击,击沉两艘敌汽艇。

日军由北岸屡犯田家镇要塞受挫,遂改攻南岸富池口。24日晚,南岸中国守军撤退,富池口失守,使北岸田家镇要塞失去策应。日军在富池口高地安装炮位,田家镇要塞炮台完全暴露在日军炮火下,日军遂趁夜扫雷。中国海军立即调77毫米野炮两个连、105毫米轻榴弹炮和75毫米高射炮各1个连于13日、14日赶赴江南增援。25日,日本陆海空军合力向田家镇要塞发起攻击,将田家镇四面包围。第一、第四分台被炸毁,日军汽艇虽被击沉多艘,但仍向要塞日益逼近。次日,马口湖失守。当晚,东南方面日军从上洲头登陆,北面日军占领黄谷脑,距中国海军炮台不足3000米,西南日军与中国海军隔湖在东北一带拉锯,南面日军则已推进到半壁山。陷入重围的中国海军炮队冒着弹雨坚守阵地,并击沉插入黄莲洲的两艘日军汽艇。28日,20余艘炮舰满载日军强行登陆,距炮台仅数百公尺。炮台中国海军官兵拼死抵抗,先后十数次肉搏。由于日军舰炮和飞机的狂轰滥炸,田家镇海军炮台全部被毁。28日晚7时,日军发起总攻,中国海军守备部队通信断绝,双方展开混战。29日凌晨,中国海军被迫撤退,田家镇失陷。

田家镇要塞失守后,武汉正面的江防仅剩葛店炮台一处。9月30日,中国海军在葛店增布水雷1120枚,使日舰在半个月内不能沿江西上武汉。10月中旬,日军向葛店发起攻击,被中国海军岸炮和水雷先后击沉舰艇10艘。10月24日,日军企图在赵家矶登陆,被葛店炮台击沉汽艇4艘。当日,数十架日机轮番对中国舰艇和要塞进行轰炸。“中山”舰在遭受15架日机轮番轰击的情况下,全舰坚守战位,英勇奋战,直至该舰沉没。25日,中国军队弃守葛店,武汉三镇遂告沦陷。中国海军的浴血奋战,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军队武汉会战的进行。

正当武汉激战之时,武汉上游荆河湘江也加紧设防,以阻止日军继续西上。海军总司令部把城陵矶作为荆湘之门户,划为要塞区,并下令组成洞庭湖区炮队,以罗致通为队长。炮队共280人,在临湘矶、白螺矶、洪家洲、杨林矶、道人矶等适要地点分设炮台,装置海炮25尊,并计划将湘江、荆河各段节节布雷封锁。^①

荆河方面,于7月间布防筹备就绪。洞庭湖方面,则在岳阳、鹿角、营田等处设置雷区。同时,在金口、城陵矶、岳州、长沙四地驻扎海军舰队担负防御。

7月20日,日军出动27架飞机向岳州方面空袭,专以中国海军舰队为目标。日机分批从高空俯冲投弹,中国海军各舰组织火力,与陆炮配合构成防空火力网。相持1小时后,日机不支逃遁。“民生”、“江贞”两舰受伤严重,舰舱进水,机件损坏亦多,遂移位搁浅。“江贞”舰副长张秉焱殉国,“民生”舰副长林庚尧负伤,官兵伤亡数十人。10月21日,“永绩”、“江元”号舰分别在新坝、岳州遭日机空袭,中国海军以舰炮还击,经过一番激战,“永绩”受伤搁浅,“江元”舰壳多处被炸坏,中国海军官兵伤亡数十人。

① 《海军抗战纪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载《民国档案》1986年第1期第63页。

第二编 全民族奋勇抗战——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沦陷

10月25日,日海军继续沿江西进。中国方面则由陈诚坐镇“江犀”舰,指挥武汉上游荆、湘两河部队继续抗击。11月9日,日海军攻陷城陵矶,12月攻陷岳阳。经过一年多的浴血抗战,中国海军实力大减,至1939年1月,仅剩9艘只能在长江上游航行的小型浅水舰。由于中国海军主力已丧失,国民政府又无力再造新舰,所以武汉失守后,中国海军的抗战便进入了“以发挥水雷战为中心”^①的新阶段,水雷封锁成为中国海军对日作战的主要任务。

为此,中国海军在长江沿线组建了三个布雷游击总队。第1布雷总队设于长沙,配合第9战区在湘江、洞庭湖一带行动;第2布雷总队设于湖北藕池口,配合第6战区在武汉沿江一带行动;第3布雷总队设于上饶,配合第3战区在长江中下游行动。

中国海军在长江沿线的节节抵抗,虽然未能阻止日军沿长江向中国内地进犯,海军主力也遭到严重损失,但是它给日本海军以重大杀伤。其中,从马当要塞保卫战至田家镇之战,中国海军在长江上共击沉日舰13艘,击伤7艘;1937年至1939年,日舰被水雷炸沉48艘,炸伤15艘,共63艘;^②1940年,中国海军在长江加强游击布雷后,共击沉击伤日军大小舰艇81艘,共约88800吨,海军兵员近3000人。^③中国海军的水雷战给日军舰船在长江航行以很大威胁。与此同时,中国海军的英勇抵抗迟滞和阻击了日军对正面战场的进攻,支援了陆地作战,如马当阻塞战把日军舰船压迫在芜湖方面达半年之久,破坏了日军对武汉实行沿江突破的企图,并使中国军队争取了一段时间从事武汉保卫战的准备;中国海军在长江上的英勇抗战,在一段时间内维持了长江航道的畅通,使

① 陈绍宽:《三年来海军抗战工作之检讨及今后发展方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王师复:《抗战三年来海军战略战术之检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③ 陈绍宽:《二十九年一年间海军战绩之检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上海、江浙、武汉等地许多工厂的物资设备通过长江水道迁往西南大后方,从而为正面战场的长期抗战奠定了经济基础。

二、东南沿海保卫战

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海军部队为沿海形势益形严重,“复飭马尾要港司令李世甲侦察密报,以资应付”。^①陈绍宽从英国回国后,命马尾要港司令部从速构筑闽江口阻塞线,确保乌江、长六地区。9月18日,中国海军将川石、马尾间所有航行标志一律破除,征用商船、帆船、沙石等,于10月中旬将堵塞线建成,并开始布雷。在加强封锁的同时,还在乌江长门地区沿江构筑工事,加强闽江口要塞的防御。

1937年9月上旬,日军出动飞机协同海军舰艇进攻厦门、汕头,均未得逞。随后,又集中兵力猛攻厦门,袭击泉州港口。中国海军各机关、陆战队被炸,要塞各台也遭到袭击,但登陆之敌都被中国守军击退。10月26日,日本海军占领金门,并进犯五通、何厝、泥金。中国守军调拨部分大炮移置五通、何厝,予日舰以重创。

5月10日,日本海军第5舰队舰艇20余艘和飞机30余架,向海军厦门要塞发起攻击。日军先向何厝猛攻,掩护20余艘汽艇在五通附近登陆。中国海军香山、霞边两炮台进行英勇还击,日军飞机和军舰以炮火击毁两炮位,何厝、江头、禾山相继失守。同时,日军驱逐舰从正面进攻厦门港外的白石炮台,一部日军从海边的黄厝、塔头登陆,围攻胡里山、白石、盘石炮台。日军出动几十架飞机不断轰炸,中国守军弹尽援绝,被迫后撤,总台长张元龙失踪。11日午,日军占领厦门。要港司令高宪申奉陈仪令转移漳州待命,当晚在嵩屿收容部队。时厦门对岸的屿仔尾炮台仍在中国海

^① 《海军抗战纪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载《民国档案》1986年第1期第64页。

第二编 全民族奋勇抗战——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沦陷

军手中,盘石炮台长邓宝初率本台余部渡海支援。日军再次发动猛攻,守军拼力苦守,一直坚持到13日下午,中国守军炮台弹药与备件全部被敌炸毁,无法继续抵抗,最后退出厦门。所有驻厦海军人员撤到马尾,与马尾要港司令部合并,厦门海军的7个机关单位全部裁撤。

厦门既失,福州受到威胁。5月23日,日舰向梅花、黄岐、北菱各处炮击,飞机亦出动轰炸。5月31日,扼守闽江封锁线的“抚宁”、“正宁”、“肃宁”炮艇迎战日军飞机,日军不支遁去,中国海军“抚宁”号也中弹下沉。6月,日海军攻占闽江口川石岛,在岛上构筑工事,设立炮台,与中国海军马尾长门要塞相对峙,彼此不断发生炮战,日机也不断向马尾中国海军轰炸。防卫闽江口的中国舰艇全部被日机炸沉或炸伤搁浅。但中国海军始终坚守要塞,同日军对峙了3年。1941年4月,日军攻陷福州后,中国海军奉命弃守马尾。

在广东沿海,1937年9月6日,日舰炮轰珠江口的赤湾,占领东沙群岛。13日,又轰击大鹏湾,海军陆战队登陆。次日,日舰又攻虎门。虎门要塞和广东海军“肇和”等舰奋力还击,并出动飞机攻击日舰,共炸沉敌舰1艘,炸伤3艘。这是中日海军在抗战中惟一次舰队交锋,以中国海军获胜而告结束。从16日始,日军频繁向中国海军发起进攻,并派出飞机轰炸中国海军军事目标,先后将“肇和”、“舞风”等多艘舰艇炸沉。次日晚,广东当局宣布封锁珠江口,不许任何舰船通过虎门炮台。

1938年9月14日,日本海军依据9月7日日本御前会议关于进攻中国华南、夺取广州的决定,以巡洋舰1艘、驱逐舰3艘自零汀洋驶向虎门,准备进犯广州。中国海军第4舰队和虎门炮队向其发起炮击,击沉日驱逐舰1艘,余舰退去。日海军受挫后,乃改以飞机向中国军舰实行轰炸。9月25日以后,日军轰炸更为集

中、猛烈。由于中国舰艇防空火力差,大多被日机炸沉炸伤。第4舰队主力遭到严重损坏后,将余舰重新编组,在珠江口警戒。同时,中国海军在珠江口海域加紧布雷,使企图进犯广州近10艘日军舰艇在珠江口触雷。日军无法经由珠江口攻占广州,乃于10月12日出动飞机百余架,掩护舰船500余艘,分路由大亚湾登陆,经东江迂回包抄广州。21日将广州攻陷。同日,日海军配合其陆军第5师团由珠江口溯江而上,猛攻虎门,海军虎门要塞官兵在腹背受敌情况下,同日军激战两日,终于不支。23日,日军攻占虎门。

广州失守后,广东省江防司令部转进西江,封锁肇庆峡,主要任务是游击布雷。在粤海军布雷队在韩江、西江、东江、北江等水道及重要支流布雷,阻止日军沿江内侵。1939年11月,日军攻陷南宁,海军即于邕江上下游布雷封锁,限制日军水上行动。从1939年至1944年,两广地区布雷封锁先后炸沉炸伤日军舰艇15艘,并捕俘伪广州要塞司令等重要官员7名。

海军在闽浙地区水域也实行布雷封锁。同时,中国海军拆卸搁浅舰艇之火炮,移装各要塞炮台,加强防御力量。1939年至1940年,中国海军在此水域先后击沉击伤日舰5艘。1941年春,日军进攻闽浙时,在瓯江、闽江各江口均遭到中国水雷和要塞炮队之打击。1942年5月,日军发动浙赣会战,中国海军为阻止日舰溯江上驶,从5月中旬起,分别在椒江、桐江、瓯江、蓝江各军事要点布放了一批定雷。因浙东沿海各江雷区严密,日海军无法与陆军协同作战。金华失陷后,中国海军布雷队集结于福建建阳、留焉,漂雷队于浙江乐清,在瓯江口相机布雷,配合要塞炮队打击进犯之日舰。日军海军向瓯江口的进攻,由于雷区的封锁,始终无法前进。

中国海军在东南沿海的英勇保卫战和布雷作战,迟滞了日军在沿海港口的登陆,给日本海军以不小的杀伤,有力地配合了中国

军队在东南沿海地区的陆地作战。

三、中国空军英勇出击

中国空军实力较弱,七七事变爆发时仅拥有 35 个中队 305 架飞机,在淞沪、南京的一系列空战中,中国空军消耗殆尽。1937 年底以后,中国空军得到苏联的大力援助,至 1938 年 2 月拥有作战飞机 249 架。^①而日军到 1938 年 6、7 月份,仅在华中用于武汉会战的就有德川航空兵团和海军第 2 联合航空队,拥有飞机 463 架。而且在武器补充方面,日本年产飞机 1 000 余架,中国则不能生产飞机,全部仰赖进口。自 1937 年 9 月 4 日第一批苏联援华作战飞机到达中国,至 1940 年 12 月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崔可夫向蒋介石报告又一批援华军火到达时止,苏联共援华飞机 1 562 架。^②虽然苏联在抗战期间给中国以大力援助,但与日军实力相比毕竟还是有限,而且因运输困难,不能及时补充。面对空中力量对比的敌强我弱,中国空军克服了重重困难,英勇出击,在空中战场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军队在武汉等地的作战。

1938 年 2 月 18 日上午,日军从南京、芜湖等地起飞了 12 架重型轰炸机和 26 架三菱九六式战斗机,沿长江向武汉飞来,企图对武汉进行一次大规模空袭。中国空军出动已有击落 60 架敌机之光荣的第 4 大队在武汉近郊拦截日机。大队长李桂丹和中队长董明德分别率第 22 中队的 11 架伊—15 战斗机和第 21 中队的 10 架伊—16 战斗机从汉口机场起飞迎战。随后第 23 中队长队吕基淳率伊—15 战斗机 8 架从孝感机场起飞投入战斗。经过一番激战,中国空军取得击落 11 架日机的辉煌战绩,同时,中国空军损失

① 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杨杰档案数字计算。

② 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杨杰档案数字综合而得。

严重,除损失4架飞机外,大队长李桂丹,中队长吕基淳和队员巴清正、王怡、李鹏翔壮烈殉国。中国空军赢得了武汉保卫战中的首次空中大捷。

4月29日,日军不甘心首战武汉的惨败,再次出动海军航空兵精锐的佐世保第12航空大队21架战斗机和18架重型轰炸机空袭武汉。中国空军出动了两个大队67架战斗机进行空中拦截,并在战斗中采用了新战术,即由刘宗武队长先率一队战斗机引开、缠住日军战斗机群,然后由董明德队长率另一队战斗机专门攻击日军重型轰炸机。中日空军在武汉上空展开激战。中国空军勇士陈怀民在驾机与敌战斗机群作战时,遭到5架日机围攻,并且座机中弹负伤。陈怀民遂毅然驾机猛撞敌机,与敌机同归于尽,谱写了壮丽的生命之歌。经过半小时激战,日军共有11架战斗机和10架重型轰炸机被击落,50多名飞行员毙命,2名被俘。中国空军损失了12架飞机,伤亡飞行员数人,再次取得了空中大捷。^①

“2·18”和“4·29”两次大空战沉重打击了日军的气焰,在这之后一个月內不敢贸然大规模空袭武汉。5月31日,经过休整的日军又派出战斗机36架,重型轰炸机18架空袭武汉,并加强了战斗机护航,企图用战斗机阻止中国空军的拦截,缠住中国空军的战斗机,然后用轰炸机乘隙偷入市区投弹。中国空军识破了日军阴谋,对日机进行包围、四周压迫。日军见我有备,心无斗志,纷纷掉头东逃,未敢进入市区投弹。中国空军乘日机退却队形混乱之时,穷追不舍,又一举击落日机14架,自己则付出2架飞机的轻微代价,赢得了“5·31”空战大捷。

中国空军在进行空中拦截、防空作战的同时,还主动出击,对日军机场进行轰炸,把日机消灭在地面上。据不完全统计,1938

^① 陈富安、刘光明主编:《武汉会战研究》第257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3月版。

第二编 全民族奋勇抗战——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沦陷

年1月至6月间,中国空军轰炸日军机场20次以上,共炸毁日机百余架。仅1939年4月就炸毁停在地面的日机31架。^①1938年6月,日军开始从地面对武汉发动进攻后,为配合地面战场作战,日军进一步加强了对武汉的空袭。仅1938年8月一个月内,日军就空袭武汉12次,武汉三镇落弹1715枚,居民死伤3112人。8月3日,日军出动了重型轰炸机18架,由50架战斗机护航进犯武汉,中国空军及时起飞拦截,于武汉南郊上空与日军激战,取得击落日军战斗机11架,重型轰炸机1架,自己6架飞机受损的空中大捷。与此同时,中国空军还以武汉为基地在武汉外围许多城市上空展开防空拦截作战。如1938年2月17日长沙空战,中国空军击落日机2架;2月25日南昌空战,中国空军击落日机8架;4月11日,归德空战,中国空军击落日机7架;7月21日,南昌空战,中国空军击落日机4架,等等。

中国空军除防空作战外,另一主要任务为配合支援地面战场陆海军作战,并为从心理上震慑日军,打击其上气,组织了数次跨海远征作战。1938年6月,中国空军出动飞机炸伤长江中敌舰12艘,击沉2艘,阻止了日军企图沿江西侵武汉。7月,中国空军与苏联空军志愿队共出动飞机50多架次,昼夜不停地对东流、九江间敌舰敌船及沿江敌机场进行轰炸,共炸沉敌舰12艘。8日,中国空军轰炸安庆一带日舰及日本登陆部队,以阻滞其增援,断绝其接济,共炸沉大小敌舰9艘,炸伤23艘。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空军仅7、8、9三个月内就出动机群55次,炸沉日舰船53艘,重创80多艘。^②与此同时,中国空军为直接打击日军地面部队,支援陆军作战,出动飞机攻击日军的指挥部、车站、军用列车、仓库、浮桥、炮

① 陈富安、刘光明主编:《武汉会战研究》第257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3月版。

② 陈富安、刘光明主编:《武汉会战研究》第257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3月版。

兵阵地、步兵集结点、机械化部队及行军队列等目标,给日军造成重大损伤。如9月27日、10月2日、10月5日,中国空军连续出动大批飞机,协助地面部队扫荡罗山之敌,日军伤亡惨重。10月9日和10日,中国空军袭击田家镇江面的敌舰和日军阵地,取得了重大战果。

1938年2月23日,中国空军从武汉出动轰炸机,低空飞越台湾海峡,对被日军占领的台北机场进行空袭。中国空军以3架飞机为一队,对机场进行轮番轰炸。日军对此突袭毫无防范,中国空军炸毁日机达三四十架。5月19日下午,中国空军第14队队长徐焕升和副队长佟彦博,带领队员分驾重型轰炸机,从汉口起飞,开始了中国空军历史上空前的壮举——跨海远征日本本土。5月20日晨2时许,到达日本长崎市上空,日军毫无防备。中国空军在长崎、福冈等地撒下了大量传单和小册子,揭露日军侵华暴行。5月20日上午11时许,远征的空中勇士凯旋。中国空军远征日本,显示了中国空军具有打击日本本土的力量,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中国空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英勇奋战,给了日本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大量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延缓、迟滞了日军对武汉等地的进攻,使得武汉保卫战更能持久,延迟了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到来。

第五节 山西、山东、河北等民众抗日武装的建立和游击战争的开展

一、山西新军的组建与发展

七七事变后,中共中央接连发出指示,要求华北党组织迅速、切实地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用极大的力量发展抗日的民众运动,组织、动员起千百万民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保卫华北。华北各地中共党组织迅速深入乡村,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组织起了许多支民众抗日武装。

早在1936年下半年红军东征回师后,中共中央就派薄一波等人去山西,与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发展了合作抗日的特殊形式的统战关系。是年9月,阎锡山为表示抗日,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某些进步措施和口号,组织了一个抗日救亡团体——抗日牺牲同盟救国会(简称牺盟会),由阎自任会长,邀请和吸收共产党人和抗日进步人士参加和负责牺盟会的日常工作。为推动山西救亡运动的发展,推动阎锡山抗日,共产党方面接受了邀请,薄一波、宋劭文、牛荫冠、冯基平等一批山西籍共产党员开始在牺盟会中积极工作,利用这一组织深入山西各县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和组织、训练工作,使山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救亡新局面,抗日进步力量也通过牺盟会组织而逐步形成了山西“新派”的领导力量。

全国抗战爆发后,山西形势急速变化。日军在占领平津后,很快向山西进逼。阎锡山为应付危局,急欲扩充军队,并更多地依靠牺盟会来组织抗战力量,于是他接受了薄一波等人的建议,下令由“牺盟会”组建新军,名称为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简称“决死队”),

由牺盟会当时举办的军政训练班、民训干部、教练团和国民兵军官教导团第8、第9团各部组成。1937年8月1日,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1总队(相当于团)在太原正式成立,一个月后,迅速发展为4个总队,后又相继扩充为第1、第2、第3、第4纵队和工人武装自卫队、政卫旅等,统称“山西新军”。^①新军成员基本来自各阶层的爱国青年和革命知识分子,经阎锡山同意,新军实行政治委员一长制,由薄一波、张文昂、戎子和、雷任民等分任纵队政治委员,并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因而它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受八路军总部指挥的民众抗日武装。

1937年9月21日,根据中共中央在山西建立3个战略支点的部署,薄一波率决死总队向晋东北进军,先期开赴五台。在八路军主力未抵之前,由决死总队控制该地区。11月,按照朱德总司令的指示并取得阎锡山同意,决死队先后开赴晋东南、晋西南和晋西北,协同八路军主力进行群众抗日工作,展开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12月,日军纠集步、骑兵5000余人从平遥、阳泉、昔阳、和顺、寿阳、榆次分6路围攻驻扎在寿阳以南松塔、马坊地区的决死第1纵队。面临强敌,决死第1纵队英勇作战,5天内毙敌600余,粉碎了敌人围攻,经受了战斗考验。^②

1938年初,日军分9路围攻晋东南抗日根据地。为配合八路军主力作战,粉碎敌人围攻,决死第1纵队组织群众进行空舍清野,并担任了牵制、消耗、袭击来犯之敌,拖垮敌军的任务。2月下旬,决死1纵队配合129师主力在神头岭进行的歼灭战,在夏店附近出击日军,毙敌50余,随后迅即转至三不管岭,再次袭击日军。

① 《决死队抗日战史》,第14军军史丛书,军科院藏。

② 见军科院存《决死队抗日战史》,第14军军史丛书。

第二编 全民族奋勇抗战——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沦陷

致敌死伤逾百。^① 敌因摸不着我主力部队行踪,疲于奔命,逐步陷于困境之中。此后,决死1纵队又与友军第83师、第47师协同,在进占沁源之敌被迫撤退时截击、追击之,并配合八路军第344旅收复了沁县县城。^② 4月27日,决死1纵队第2总队再次与第344旅配合,侧击长治南退之日军,先后在襄垣的虎亭、长治、高平地区进行战斗,毙敌百余,收复了长治县城。^③ 在这次反敌9路围攻作战中,决死队为保卫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发挥了作用。

反围攻作战胜利后,决死第1纵队又活跃于同蒲铁路之霍县至临汾段。5月13日,纵队第1、2总队袭击临汾车站,全歼守敌30余人。此后,又对洪洞县大、小胡麻据点进行突袭。为掩护灵(石)介(休)县政府开展工作,第3总队巧妙袭击了介休洪山村的日军,毙敌60余人。夏季,第3总队又发起榆次北田战斗,破坏马首至上湖段铁路,使日军一列运输车脱轨,伤亡惨重。8月28日,决死1纵队一部夜袭赵城磨头火车站附近之三关庙据点,打死、打伤敌111人。^④

在晋西北,决死4纵队配合第120师反围攻,展开七城战役,在围困岢岚和追击残敌中胜利完成了阻击和袭扰任务。^⑤ 晋西南政卫队从1938年2月起,也先后进行了黑龙关、三关峪、古城镇、秦王岭、店头村、王庄等战斗,在晋南反“扫荡”战斗中屡立战功。决死3纵队也打了不少好仗,其中尤以夜袭沁水城的激烈战斗为最。4月20日,3纵队第9总队分数路攻入沁水城,打死守敌近百

① 见军科院存《决死队抗日战史》,第14军军史丛书。

② 见军科院存《决死队抗日战史》,第14军军史丛书。

③ 见军科院存《决死队抗日战史》,第14军军史丛书。

④ 见军科院存《决死队抗日战史》,第14军军史丛书。

⑤ 见军科院存《决死队抗日战史》。又见薄一波《回忆山西新军》,载《八路军回忆史料》第165~167页。

名,迫敌撤退,占领了县城。7月,敌一运输大队300余人、汽车百余辆由阳城开沁水,在翼城、沁水间的车坞岭遭3纵队第7、第8总队各一部伏击,被全部消灭。^①同年秋,决死3纵队又参加了正太路与同蒲路连接处附近之北营、鸣季段的铁路破击,袭击寿阳东关,炸翻火车一列,缴获大批军用物资。^②

1937年冬至1938年夏是山西新军大发展的时期。牺盟会在山西进行救亡运动所做的颇有成效的工作,为山西新军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而八路军主力开赴山西战场英勇作战,给山西以至全国人民以振奋,对山西新军的壮大也起了巨大作用。山西新军在共产党人和其他抗日进步人士的实际领导下,与八路军主力密切配合,为创建、保卫抗日根据地立下了卓著功勋,而本身也在此过程中得到发展。到1939年年底(“晋西事变”前),山西新军已拥有:(1)4个决死纵队,每纵队辖3个总队和3个游击团,合计24个团;(2)一个工人武装自卫总队,辖3个团;(3)3个政治保卫旅即第209、212、213旅,每旅辖3个团,合计9个团,外加3个游击支队(团);(4)1个暂编第1师(由第2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总动员委员会组织领导),该师辖4个团,1个游击支队(团)。^③以上全部新军共50个团(其中46个正规团,4个游击支队),约5万多人,^④在实际兵员和武器数量上都超过了山西旧军,成为活跃在山西各

① 见军科院存《决死队抗日战史》,亦见薄一波《回忆山西新军》,载《八路军回忆史料》第165~167页。

② 见军科院存《决死队抗日战史》,亦见薄一波《回忆山西新军》,载《八路军回忆史料》第165~167页。

③ 第2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总动员委员会,成立于1937年9月,由共产党员、八路军以及晋绥察三省政府、军队、群众代表组成,常务委员续范亭。委员会设组织、宣传、人民武装等部,各专区和县均有相应机构。

④ 山西新军发展情况见黄华《关于新军发展概况报告》1939年,军科院藏。

地的一支主要抗日民众武装。

二、河北民众抗日武装的建立

日军占领平津后,河北广大地区沦入敌手。遵照中共中央和北方局关于发动和组织人民抗战的指示,中共保属省委决定所属党员、干部,一律就地坚持抗日斗争,组织武装,开展游击战。9月,日军沿平汉、津浦两线进攻,大批枪支散落民间,省委立即在各地广泛发动青年,组织武装,于两、三个月内,在高阳、蠡县、定县、安国、天极、藁城、正定等县先后组织起河北游击军、抗日义勇军、人民自卫团等共二三千人的抗日队伍。

1937年10月,东北军第53军第130师第691团在团长吕正操率领下,拒绝南撤,回师冀中,改称人民自卫军,与河北游击队等抗日武装会合,在当地发动群众,消灭土匪汉奸,开展游击战争,并收复了深泽、安平、博县等县城。部队也由此得到发展,成为有第1、2、3团和特务团4个团3000多人的一支抗日武装。是年12月,该部转平汉路西整训。于此期间,在中共保属省委的领导下,冀中相继建立了高阳、安新、新安、任丘、蠡县、博野、安国、深泽9个县的抗日政权。各县并普遍组织了各界救国会团体、人民自卫武装。至1938年1月,河北游击军发展到70000多人,号称“十万”。冀中抗日力量的迅猛发展给日军以严重威胁。这时日军主力尚集中在第一线,后方交通沿线仅有少数兵力驻守,暂时抽不出较多兵力“扫荡”,乃实行袭劫、屠杀政策,于1937年底、1938年初派兵占领高阳、安新和新乐,并在边沿区建立伪政权与我对抗。

为巩固冀中,自卫军整训部队根据晋察冀军区指令迅速返回冀中,协同河北游击军袭击日据点,破坏平汉路,打击汉奸土匪武装,并于1938年2月以一部北进大清河地区,连克新镇及霸县、永清县城,同时粉碎了日军的两次规模较大的“扫荡”,收复了高阳、

安新。4月下旬,河北游击军在抗击了交河、献县日军向河间的进犯后,乘胜收复了河间城。至此,冀中腹地土匪、日伪势力基本肃清,并在38县中建立起了抗日民主政权,西起平汉,北至北宁,南达沧石的广大地区基本为我控制。

4月下旬,冀中区党委成立,接着又成立了冀中行政主任公署和冀中军区,人民自卫军与河北游击军合编为八路军第3纵队,吕正操任纵队和军区司令,王平任政治委员,下辖4个支队和4个军分区,冀中抗日根据地得到开辟。

河北平西地区包括宛平、房山、涞水三个县大部,良乡、怀来、昌平、延庆等县一部。七七事变后,东北流亡学生赵同、高鹏等在北平近郊沙河、昌平一带拉起一支队伍,这支队伍在中共地下组织帮助下,发展为国民抗日军,主要活动于北平近郊地区。1937年8月22日,抗日军袭入北平德胜门敌监狱,救出被捕同胞、爱国志士数十人,给敌造成震惊。抗日军声望不断增加,短短两个月后即发展成拥有千人的抗日武装,并于12月受八路军总部之命,编为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5支队。

为协助第5支队开辟平西,发展冀东抗日游击战,1938年3月,由军分区政治委员邓华率领,组成邓华支队,挺进平西,接连攻克樊山堡、门头沟、桃花堡等敌据点。在第5支队协同下,把抗日游击战争推进到房山、涞水、良乡、宛平、昌平等地,成立了县的抗日联合政权。1938年5月,晋察冀军区在平西设立了第5军区分区,地方工、农、青、妇抗日救国会也相继建立,平西区抗日游击战得到初步发展。

冀南地处平汉路东,沧石路南,卫河以西,漳河以北,拥有34个县,境内有卫河、漳河、滏阳河、沙河、里河等5条河流,除尧山县西北之尧山外,全是一片平原。1937年10月,德州、邯郸先后陷落,冀南除南宫、清河、枣强、巨鹿等县外,悉数为敌占领。但为时

第二编 全民族奋勇抗战——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沦陷

不久,日军因一线需要大部南进,仅留少量部队控制德州经临清、馆陶、邱县至邯郸,临清经威县至邢台两条主要交通线。为不失时机打开冀南抗日局面,中共北方局于1937年10月成立了冀南特委,派马国瑞等返回当地,着手恢复地方党组织,发动民众抗日,在短期内于南宫、广宗、巨鹿一带组织起一支200多人的游击队,命名为八路军别动大队。赵县、藁城、栾城一带组成了沿用友军番号的第5路军,在漳南区也组织了命名为民军第2路第4支队的游击队。以赵辉楼为首的受中共影响的知识分子也在宁晋、束鹿一带建立了民众抗日自卫军。这些武装的建立为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建立提供了基础。1937年底,八路军第129师教导团干部30余人组成挺进支队越过平汉路进入冀南,又以第769团4个步兵连、1个机枪连、1个骑兵连组成八路军东进纵队,由第386旅副旅长陈再道和冀鲁豫省委书记李菁玉率领,挺进平汉路东,控制了南宫附近数县地区,在那里安定社会秩序,收编民军和匪、伪武装,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政权,冀南抗日工作遂展开了局面。

三、山东民众抗日武装起义

1937年10月,日军占领德州,12月下旬分两路渡过黄河,次年1月占领济南。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消极避战,率十万部队和政府机关南逃,山东广大地区沦入敌手。但敌仅占领了铁路沿线城镇,远离铁路的广大地区是空虚地带。

早在敌占德州之时,中共山东省委即对形势作了充分估计,在10月上旬召开的省委会议上详尽讨论了发动群众,建立数万武装,配合八路军开展游击战争的任务,决定抓住日军入侵,国民党撤退,人民抗日情绪高昂的时机,及时领导人民举行抗日武装起义,并具体拟定了分区发动起义的计划。为此,中共中央和北方局先后给省委派出了一批干部,作为领导武装起义的骨干,山东各地

党组织也立即行动起来,深入民众,集聚力量。因此,在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踏入山东后,中共领导下的民众抗日烽火便遍地燃烧起来。

最早发动的是中共冀鲁边工委领导的盐山等地的抗日民众起义。1937年11月间,日军占据了盐山,冀鲁边人民最先遭到日军的蹂躏。在当地救国会的领导下,盐山一带的民众揭竿而起,成立了人民抗日救国军。1938年11月,起义部队攻克盐山,消灭伪军400余人,日军30多人;2月间,又乘胜攻克无棣县城;随即挥师西进,占领乐陵;进而收复南皮东部地区;又于3月间争取了庆云伪军一部反正,里应外合收复庆云城,并很快在乐陵、庆云、南皮3县成立了抗日民主政权。由于起义部队积极打击日伪,极大地鼓舞了人心,扩大了影响,“人民抗日救国军在短期内发展到两千多人”。^①

在鲁西北地区,中共鲁西北特委与国民党山东第6区专员兼保安司令范筑先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实行共同抗战。日军侵入山东后,范筑先在共产党员的推动、帮助下,在聊城坚持抗战,中共与之配合,一起发展了抗日武装,在范部19个支队中建立了中共组织,并独立组建了第10支队。这支武装由中共直接领导,活动在鲁西北平原和肥城附近的大峰山区。

在胶东地区,中共胶东特委在1937年12月间直接领导了文登东部的天福山起义,成立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第3军。为扩大影响,第3军于2月13日拂晓袭入牟平县城,俘虏伪县长以下170余人。战斗结束后,部队撤往城外休息,被烟台来援之敌包围。日军在4架飞机支援下,向雷神庙内第3军指挥部进攻。庙内同志临危不惧,依托院墙顽强抗击,连续打垮敌人4次冲击,战

^① 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战史编辑室编:《山东军区战史》。

第二编 全民族奋勇抗战——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沦陷

至黄昏,终在庙外部队配合下将敌击退,并击落敌机1架。起义武装在一天内攻克牟平、血战雷神庙的胜利很快传遍了胶东。3月,第3军一部又收复福山城,摧毁了该县日伪组织。4月间队伍发展到1000余人。与此同时,胶东掖县、蓬莱、黄县等地民众也在中共领导下组织了抗日武装,收复了3县县城,建立了掖县和蓬莱的抗日民主政权。为统一胶东人员抗日武装力量,1938年4月,第3军军政委员会将各地起义部队分别编为第1、第2、第3、第4路,各路设指挥部,下辖若干大队。第3军成为一支拥有7000余人,威震胶东的抗日生力军。^①

继天福山起义后,就在济南陷落的当天,毗邻济南的长山与临淄之间的黑铁山也爆发了民众抗日武装起义,在中共领导下,成立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第5军。起义部队于1938年1月中旬袭入长山城,消灭了伪“维持会”的武装,又在陶塘口、安家庄(邹平城北)小清河两岸埋伏,利用民船构成拦河障碍,以步枪、手榴弹、土炮击沉敌汽艇1艘。敌为了报复,由周村调动日伪军400人,向驻长白山区(长山城西南)的起义部队进攻。起义部队在群众支援下,扼守高地与敌激战终日,毙伤敌伪百余人,敌狼狈撤回。此后,起义队伍又开辟了邹平、益都、临淄地区,并与淄川矿区的武装共同攻克淄川城。至1938年春,这支队伍已发展到6000余人,活动在小清河以南、胶济线南北的广大地区。

与上述两次起义几乎同时爆发的是由中共山东省委直接领导的徂徕山起义。为发动这次起义,中共山东省委、泰安地委做了大量准备工作。1938年1月1日,组织起来的抗日民众在徂徕山光华寺召开了起义誓师大会,宣布成立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4支队,下辖4个中队。队伍略行整顿,即对敌开始战斗。1938

^① 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战史编辑室编:《山东军区战史》

年1月中旬,在寺岭(泰安至新太的公路上)用地雷炸毁敌3辆汽车,歼灭日军40余人,取得首战大胜。此后,队伍分两路发展。一路向新太、蒙阴、费县、泗水方向活动,一路向莱芜、淄川、博山一带活动,与由清河区南下的第5军一部会师,协同博山当地民众,武装攻入博山,歼灭守城伪军。由于我队伍英勇战斗,人民群众踊跃参加,各地起义武装纷纷前来会师,至1938年4月,第4支队迅速发展到了4000多人。^①

从天福山起义到徂徕山起义,前后仅一周时间,继此之后,山东民众抗日武装起义风起云涌。1937年底,中共鲁东工委领导寿光、潍县、昌邑等地人民武装起义,成立了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7、第8支队。1938年1月1日,泰西夏张镇也爆发了抗日民众起义,起义队伍开进肥城山区整顿,成立了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在津浦路附近给敌以打击,台儿庄作战时,在津浦线黑虎泉(泰安南)一带翻倒敌弹药车一辆,毙伤押车日军20余人,弹药车的爆炸持续了五六小时,致使七八天未能通车。起义部队还将泰安城北万德车站附近的铁路、公路、桥梁全部炸毁,并袭击敌修路部队,有力地支援了徐州会战。在鲁东南,中共在沂水以西组成了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4支队第6大队。在鲁南,中共以第5战区动委会的名义发动群众抗日,在日军向徐州外围推进时,在沛县、滕县、峄县发动了民众抗日起义,成立了鲁南人民抗日义勇队第1总队,在滕、峄边区之南塘一带打击敌人。5月,他们在临(城)枣(庄)公路上的邹坞、大甘林等地设伏,袭击敌辎重部队,毙敌数人。徐州沦陷后,山东微山湖西的人民也揭竿而起,在中共苏鲁特委和鲁西南工委的领导下,成立了苏鲁人民抗日支队第2总队。当日军沿铁路、公路大举西进时,这支队伍配合单(县)砀(山)

^① 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战史编辑室编:《山东军区战史》。

第二编 全民族奋勇抗战——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沦陷

边区的会门武装,在砀山西北的马良集截击敌人,毙敌数人,8月又袭入肖县西北之黄庙据点,全歼日军一个小队,缴获军用品若干。^①

总之,自1937年底至1938年5月间,在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领导下,山东大地抗日烽火遍燃,武装起义此伏彼起。在不到半年中,全山东十几个地区普遍创立了抗日基地。起义的民众武装对日作战大小近百次,从日军手中收复了肥城、长山、邹平、淄川、牟平、蓬莱、掖县、黄县、福山、盐山、庆云、乐陵、无棣、莱芜、博山等15座县城,不仅在徐州会战期间有力支持了津浦前线我军正面作战,而且迅速打开了山东抗日的局面,起义队伍至1938年夏已达4万余人,为日后八路军主力入鲁作战和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四、东北抗联配合全国抗战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东北日军大批入关,侵略华北。东北日军守备力量较弱。抗联各军乘此良机,主动出击,打击和牵制日军,积极配合全国抗战。

1937年7月16日,杨靖宇率第1军一部从桓仁出发,向兴京、清源挺进,把抗日游击战争推向辽宁西部。18日,该军第3师在开原县与日军交战,击毙冈田中佐和板本少佐以下13人。不久,又在清源县七道河子设伏,击毁敌汽车一辆,毙日军20余人,缴获机枪一挺,长短枪20余支。7月,抗联第一路军发表《为响应中日大战告东北同胞书》,东北同胞,乘机崛起,为“恢复中国人之东北”而战。^② 第一路军在杨靖宇的领导下,确定了在东南满地

^① 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战史编辑室编:《山东军区战史》。

^② 孙继英:《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第154页。

区,猛烈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全力牵制日军人关,支援关内抗战的任务。第1军在兴京、桓仁、宽甸、清源、开原等县,频繁袭击敌人。9月13日,该军第3师手枪队深入沈阳东陵滴台活捉伪奉天省公署高级官员日人村上博。不久,又潜入抚顺城内活动,使敌大为惶恐。10月底,杨靖宇指挥第1军军直部队在宽甸县四平街地区袭击日军守备队,毙伤日军水出大队长和陆岛小队长以下20多人,烧毁敌汽车2辆,缴获步枪30余支。12月初,杨靖宇指挥军直属队在本溪县南营房附近设伏,毙伤日伪军20名。^①

抗联第1路军第2军在辉南、濛江、长白、临江、抚松、桦甸、金川、安图等地猛烈地打击日伪军。七七事变后不久,第2军第5师一部和第5军相配合,在敦化县涉河沿与敌交战,一举歼敌百余名。10月下旬,魏拯民率第2军一部,夜袭日伪盘踞的军事重镇辉南县城,毙日军20余名,获取大量军用物资。11月中旬,第2军第4师在桦甸老金厂附近设伏,全歼伪军一个营。12月中旬,魏拯民指挥第2军一部,夜袭濛江排子敌宿营地,歼敌200余名,缴获两部地线电收发报机和大量的枪支弹药。^②

据粗略统计,从卢沟桥事变到1937年底,抗联第一路军进行较大规模的战斗有33次,毙伤、日伪军1400余人,有力地配合了全国的抗日斗争。^③

七七事变后,战斗在松花江中下游的抗联第4、5、7、8、10军,协同作战,屡创敌军。8月13日,第2、4、5、8军各一部,联合攻击勃利县三道通日军,毙伤口军40余名,缴获步枪4支,子弹500发。8月21日,周保中指挥第5、8军各一部和独立师骑兵队,在

① 《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第315页。

② 霍燎原:《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第156页。

③ 《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第17页。

第二编 全民族奋勇抗战——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沦陷

依兰县五道岗诱击日军黑石部队,毙伤日军 350 余人,毙敌战马 200 余匹,缴获轻机枪 10 余挺,四四式马枪 220 支、金鞍马 50 匹及许多战利品。^①这一战斗后,敌人半个月不敢出扰。10 月上旬,抗联第 4、5、7、8、10 军着手筹备组建抗联第 2 路军。周保中、柴世荣、李延平、王光宇、陈翰章、姚振山等为筹备委员,周保中担任总指挥。^②这一筹备工作,促进了第 4、5、7、8、10 军的团结抗日。10 月下旬,第 5 军第 2、3 师联合攻破富锦、宝清之间的大孤山伪军据点,毙敌 10 余名,俘敌 50 余人,缴步枪 50 余支。12 月中旬,第 5、7 军各一部,联合袭击宝清县七星河镇,毙日军指挥官以下 10 余名,伤敌 20 余名,歼灭伪军 1 个连,缴获轻、重机枪 5 挺,迫击炮 1 门,步枪 200 余支和其它战利品。1937 年底,第 2 路军正式成立,周保中任总指挥兼政委。

七七事变后,战斗在北满地区的第 3、6、9 和第 11 军,积极广泛地开展了扒铁路、毁桥梁、割电线、袭击敌人兵站等抗日游击战。1937 年秋,第 3 军一部攻占了侯大老爷大屯,摧毁了警察署,活捉了警察署长及其下属官兵。第 6 军一部毙日军 30 名,缴九二式重机枪 1 挺。7 至 10 月,第 3 军第 9 师共毙日军七十八名,俘伪军数百名,缴获轻重机 6 挺,炮 1 门,步枪百余支,子弹数万发。据统计,从 1937 年冬到 1938 年冬,第 3 军主力部队,仅在三江省(今黑龙江省合江地区)即与日伪军作战 427 次,使日伪军伤亡 7 690 人。1939 年初,第 3、第 6、第 9、第 11 军组成第 3 路军,以李兆麟为总指挥,冯仲云任政委。

整个说来,1936 年至 1937 年,是东北抗联大发展的年代。到 1937 年 11 月,抗联共组建了 11 个军,人数达 3 万余人。开辟了

^① 《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第 312 页。

^② 《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第 179 页。

东南满、吉东和北满三大游击区。抗联沉重地打击了日伪在东北的统治,有力地配合了全国的抗日战争。

第六节 华北抗日游击战由山地向平原的发展

一、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平原游击战的指示和部署

山西、河北、山东人民抗日武装的建立和游击战争的开展,对八路军完成在山西的展开和创建根据地是一个有力的策应和支援,也为八路军主力深入平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造了有利条件。1938年春,徐州会战开始,日本、华北方面军主力相继入鲁参战,冀、鲁、豫广大平原地区成为敌之空虚地带。为加强和巩固山东、河北等地民众抗日起义的战果,不失时机地创造和扩大敌后抗日区域,同时达到配合友军作战,牵制、滞留、打击日军的目的,华北八路军以山区根据地为依托,逐次向平原推进已势在必行。

1938年4月21日,毛泽东、张闻天联名致电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就开展平原游击战争作了明确指示。电文指出:“根据抗战以来的经验,在目前全国坚持抗战与正面深入群众工作两个条件之下,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广大地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坚持平原地区的游击战是可能的”。“党与八路军部队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应坚决采取广泛发展的游击战争的方针,尽量发动最广大的群众进行公开的武装斗争”。电文并强调:“应即在河北、山东平原划分若干游击分区,并在军区成立游击司令部,有计划、有系统地去普遍发展游击战争,并广泛地组织不脱离生产的自卫军,……在收复地区应即建立政府……组织民众抗日战争,镇压汉奸,保护民众利益,帮助部队筹拢给养,……使政府、部队、人民密切联系起

来。”^①

根据这一指示,八路军总部迅即作出派遣部队向冀东、冀南、冀鲁边和冀鲁豫平原地区推进的部署。4月22日,八路军总部下达命令如下:令徐向前率两个团、一个支队推进冀南;令陈再道、宋任穷部仍发展冀南,并组建一个支队挺进冀鲁边;令宋时轮支队与邓华支队组成一个纵队深入冀东;令129师主力在正太路和晋冀边区积极活动,以策应平汉路东的我军迅猛发展平原游击战争,和第344旅与决死一纵队开辟太岳山脉南部地区。^②

从4月下旬起,八路军各主力派出部队陆续出发,平原抗日游击战很快得到加强和发展。

二、八路军在平原地区的初步展开

1938年4月下旬,由八路军第129师385旅之769团和第115师344旅之689团及第685团之一营组成的八路军第5支队,在第129师副师长徐向前亲自率领下,按照总部统一部署,率先由晋东南出发,挺进冀南。

5月初,部队到达南宫地区,与先期到达的东进纵队、骑兵团等部会合。5月10日发起威县战斗,于是夜攻入威县城,歼敌百余,震慑了邢(台)临(清)公路沿线敌军,纷向邢台窜逃。支队分两种乘胜向东、向南发展,至6月上旬,临清、高唐、夏津、枣强、永年、成安、肥乡等城先后为我收复,卫河东西和漳河以北广大地区得到开辟。与此同时,第129师第386旅771团也由旅政委王新亭率领,由晋东南开至永年、肥乡、成安地区,抗日民众武装王乃贵支队

^① 《毛、洛关于发展和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给朱、彭等的指示》(1938年4月21日),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抗战史料选编》,第1辑,军科院藏。

^②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第86页。

进至栾城、赵县、宁晋一带。上述部队到达后,即与当地群众一起,清除匪伪势力,建立和改造地方政权。至6月底,先后收编、改编民团、保安队等游杂武装两万余人。7月,部队进行统一整编,编为新编第1团、冀豫支队、青年抗日游击纵队、东进纵队(包括第1至第8团和独立团)。同时部队还抽调大批党员和干部,协助地方党开展根据地创建工作。8月,冀南50余县军政民代表大会在南宫召开。会上成立了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杨秀峰、宋任穷分任正、副主任。9月,建立了全区工人、农民、妇女等各界抗日救国总会,同时在30余县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和民兵自卫队。至此,以南宫为中心,西起平汉铁路,东抵津浦线,北至沧石路,南跨漳河的冀南抗日根据地基本形成。

为钳制企图进攻潼关、洛阳之敌,进一步开辟漳河以南,8月下旬,第129师令陈再道、王新亭统一指挥青年纵队、东进纵队、第689团、新1团等部发起漳南战役。从8月底至9月初,在临漳、安阳、内黄间,连克楚旺、向隆、大韩集、崔家桥等重要集镇,又解放了豫北的滑县、道口。9月中旬,漳南兵团组成,由王新亭、杨得志指挥继续南下。经过一个多月基本肃清了平汉路东,漳河以南,卫河以西,南北近百里的伪军,并协助中共直南特委开辟、巩固了安(阳)、内(黄)、汤(阴)、浚(县)、滑(县)地区,并开始作挺进冀热边,创建冀鲁豫边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准备。

第129师徐向前率主力之一部挺进冀南,迈出了抗日游击战争由山地向平原发展的决定性一步。为钳制日军向徐州方面的机动兵力,对日本华北方面军战略要地平津地区形成威胁,并策应东北抗联的游击战争,1938年4月1日,八路军总部电示120师,在平西抗日游击战争得到初步展开的基础上,派宋时轮率雁北支队东进平西,与晋察冀军区邓华支队会合,组成八路军第4纵队,受晋察冀军区指挥,进一步向冀东挺进,开辟雾灵山地区的抗日游击

战争。^①

6月上旬,第4纵队由平西出发,取道平北,进入冀东,部队一路连克昌平、延庆、兴隆等县城,于28日抵平谷县一带。在第4纵队抵达冀东的有利形势下,中共冀热边特委根据中共北方局指示,决定立即发动民众起义,组织抗日联军,推翻冀东反共政府。从7月7日起由中共地方组织发动的抗日武装起义相继爆发,其中最大规模的是7月18日开滦煤矿两千矿工起义。在民众抗日起义的带动下,活动在这一地区的国民党游杂部队,昌黎、兴隆等地的绿林武装也纷举义旗,加入起义队伍。因此,在不到一月的时间里,冀东各地西起通县,东至山海关,北起兴隆、青龙,南至渤海湾,到处燃起抗日烈火,起义队伍迅速发展至十多万人。八路军第4纵队在起义武装配合下,积极打击日军,推毁冀东伪政权,先后收复了平谷、蓟县、迁安、玉田、乐亭、卢龙等县城和冀东广大乡村,并一度切断北宁铁路线,冀东抗日出现蓬勃发展的局面。

在第129、第120师派出部分主力深入冀南、豫北、冀东,作平原作战尝试的同时,八路军第115师也根据总部决定从冀南抽调第5支队,与第129师津浦支队一起向山东境内发展,增援冀鲁边地区。7月上旬,部队经过鲁西北,越过津浦路,进抵乐陵、宁津,在那里会合了边区人民抗日武装,开始配合地方党组织积极开展抗日工作。9月下旬,第115师政治部副主任肖华奉总部令率第343旅政治部、司令部百余名干部到达乐陵,在那里成立了冀鲁边军政委员会,并统一将该地部队整编为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肖华任军政委员会书记兼纵队司令员、政治委员。军政委员会明确提出了创建冀鲁边平原根据地的任务和大力发展抗日武装的方

^① 《朱、彭关于发展向察冀发展给贺、聂的指示》(1938年4月1日),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抗战史料选编》,第1辑,军科院藏。

针。在此一方针下,纵队建立了领导机关,下属各支队分别进行扩大和整编。津浦支队由2个营扩编为3个营;第5支队由3个营扩编为3个团,冀鲁边起义武装整编为第6支队,辖3个团。部队整编后,迅速分散发展,又先后发展起津南支队、泰山支队以及宁津、鲁北、阳信、商河、惠民等若干个地方支队。至1939年初,冀鲁边区抗日武装已扩至两万余人,在津南、鲁北之15县地区展开活动,初步完成了开辟冀鲁边平原抗日基地的任务。

大青山位于绥远境内,横亘内蒙古高原。开辟这一地区,使其与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对坚持绥远抗战,钳制日军向大西北进攻,掩护我之战略侧翼,具有重要意义。1938年5月14日,毛泽东电示八路军总部“在平绥路以北,沿大青山脉建立游击根据地,甚关重要”。^①为此,八路军总部于6月间作出决定,由第120师715团,独立第4支队和骑兵营一部,组成大青山支队,进入大青山地区。

7月下旬,大青山支队由358旅政治委员李井泉、姚吉、武新宁率领,从晋西北五寨地区出发北进,首先进抵平鲁、左云、右玉地区,在那里积极进行挺进大青山的各项准备。8月下旬,支队由绥远出发,在凉城地区留下第715团一个营,建立以蛮汗山为依托的绥南根据地,以保障晋西北与大青山的联系。9月初,支队越过平绥路,进入大青山地区。不久,支队即与当地中共领导的蒙汉两族人民游击队会合,并于9月3日袭击了陶林敌据点,随后挥戈西进大滩地区,在那里广泛发动与组织群众,建立了绥蒙抗日总动员委员会。为在该地区扩大我军影响,大青山支队在查明地形、敌情后,决定攻击归绥以北重镇乌兰花(今属四子王旗)。9日晚,支队

^① 《毛泽东致朱、彭电》(1938年5月14日),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抗战史料选编》(晋绥),军科院藏。

第二编 全民族奋勇抗战——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沦陷

由大滩进至乌兰花东南之五塔背、韭菜沟。10日夜突入镇内,击退日军一部,俘伪蒙军70余人。^①

陶林、乌兰花两次袭击作战,使日军大为惊慌,急向武川、陶林、乌兰花、百灵庙等地增强兵力。我军则乘敌调动,利用归绥、武川公路之间蜈蚣坝一带的险峻地形,打了个伏击战,歼敌80余。^②9月下旬,大青山支队主力在武川以东的后窑子地区击退了日军数百人的阻击,进入归绥至武川公路以西。10月1日,支队袭击了平绥线上的陶思浩、苏安盖等日军车站,占领了华克齐。包头、归绥之敌深感威胁。11月上旬,日军华中2000多骑兵,分4路围攻萨拉齐以北地区,企图消灭、驱逐大青山支队。大青山支队在中共地方组织配合下,依靠各族群众,以游击战与敌周旋,支队主力则趁敌出动,深入敌侧后,在马厂梁、大沟等地予日军以打击,毙敌200余,粉碎了敌之围攻。^③与此同时,第120师遂以第359旅主力向大同以东之平绥铁路沿线进袭,在友宰堡和后子口,消灭日伪军300余人,并袭击了聚乐堡、罗文皂、永嘉堡等车站。总之,从9月上旬至是年底,大青山支队在3个月中,横扫阴山几百里,初步开辟了归绥至武川公路以西之绥西,归绥至武川公路以东之绥中,及平绥路南以蛮汗山为中心的绥南等含有18个市县在内的游击基地,大青山抗日游击战得到加强和发展。

为配合正面战场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的进行,钳制和打击敌人,同时支援加强冀、鲁、豫三省平原抗日游击战的开展,不失时机地开辟和扩大敌后抗日根据地,自1938年4月晋东南反敌9路围

① 《乌兰花战斗详报》(1938年9月9日),见《乌兰花袭击战斗》,军科院藏。

② 李井泉等:《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开辟和发展》,载《八路军回忆史料》(1),第377页。

③ 李井泉等:《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开辟和发展》,载《八路军回忆史料》(1),第377页。

攻胜利,山区抗日根据地得到初步巩固后,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八路军各个部便以山区为依托,采取跳跃式和波浪式相结合的方式,积极向平原地区推进。至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八路军已在华北冀、鲁、豫广大地区的山区和平原结合部发展了抗日游击战争。在北线,沿管涔山、五台山、恒山、军都山,直至冀东雾灵山建立起晋西北和大青山,晋察冀边之北岳区、平西、平北、冀东一线山区根据地。在南线,由吕梁山、太岳山、太行山直至冀中、冀南、冀鲁豫平原等广大地区也开辟了新的抗日游击区,为更大规模地发展平原游击战争提供了前进的基地。

三、中国共产党关于持久战的理论和主张

至1938年5月,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已进至第10个月。在这10个月中,中国军民为了民族的生存、国家的命运,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殊死战斗,给敌以沉重打击,同时也付出了巨大代价。如何将抗战进行到底?今后战事将如何发展?战争结局如何?能不能取胜?……在这一系列有关抗日进程、前途、战略的根本问题上,人们心存疑虑,议论纷起。有人抱“速胜”观点,对抗战前程盲目乐观,有人持“亡国”论调,认为“战必败,战必亡”。尤其在徐州失守后,后一论调更是甚嚣尘上。对游击战在抗日作战中的地位和作用,人们的认识也莫衷一是,很多人把胜利的希望仅仅寄托在正规战上,贬低中共的抗日游击战。中国共产党也有人对此认识不清,不赞成八路军“基本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运动战”的战略方针。为了纠正上述错误观点,澄清模糊认识,并进一步向国内民众和党内同志阐明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作战的正确军事路线、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毛泽东在1938年5月间连续发表了《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两部重要著作,在总结10个月抗战经验的基础上,就抗战之性质、特点、进程、前途以及发展

规律、战略方针等问题作了全面论述。

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毛泽东首先对为什么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必然是中国这个众所关注的问题作了论证和分析。文章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①接着，毛泽东对抗战中敌我双方的基本特点作了具体分析。

日本方面：第一，它是一个强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一等的，在世界也是五六个著名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一个，这是日本侵略战争的基本条件，由此决定了战争的不可避免和中国的不能速胜。第二，由于日本社会经济的帝国主义性就产生了日本战争的帝国主义性，它的战争是退步的和野蛮的。这是日本战争必然失败的主要根据；第三，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虽强，但日本国度较小，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第四，日本失道寡助，并且遭到日益增长的国际反法西斯力量的反对。

中国方面：第一，我们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各方面都显得不如敌人，这是战争不可避免和中国之不能速胜之另一方面的依据；第二，中国的抗战是进步的、正义的，能够唤起全国的团结，激起敌国人民的同情，争取世界多数国家的援助；第三，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长期战争；第四，中国得道多助。^②

基于“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这一中日战争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点，毛泽东从全部敌我因素相互

^① 《毛泽东选集》（袖珍本），第415页。

^② 《毛泽东选集》（袖珍本），第416、417页。

关系的分析中得出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这一唯一正确的结论,同时也对“亡国论”和“速胜论”进行了有力的批驳。文章指出:“亡国论”者只看到敌人暂时强大的一面,和我们不利的一面,忽视了我们时代进步的一面和有利的方面,犯了“唯武器论”等错误;“速胜论”者或者忘记了敌强我弱这个矛盾,或者夸大了中国的长处,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自以为是,这是战争问题上的主观性和片面性,犯了“唯心论”的错误。^①

在科学分析了中日双方基本特点、力量对比及其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毛泽东又进一步对持久抗战的发展阶段作了科学的预见。他把整个抗战时期分为3个阶段:第一,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阶段;第二,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战略反攻的战略相持阶段;第三,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阶段。^②毛泽东并为这三个阶段战争发展的轮廓以及每一阶段中我军相应之主要作战形式作了勾勒、描画和说明,他指出:

第一阶段,日军挟其军事优势,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攻城掠地,妄图在短时间内灭亡中国。这时中国所采取的战争形式,“主要是运动战,而以游击战和阵地战辅助之”。由于日军兵力不足,中国的游击战争乘着敌后空虚将有一个普遍的发展,中国虽有颇大的损失,但也有颇大的进步,这种进步就成为第二阶段继续抗战的主要基础。

第二阶段,进入相持阶段。在这一阶段中,由于敌人兵力不足和我之坚强抵抗,敌人在第一阶段末期不得不停止其战略进攻,转入保守占领地的阶段。此阶段将仍有广大的战争,“我之作战形式主要是游击战,而以运动战辅助之”。除正面防御部队外,我军将

① 《毛泽东选集》(袖珍本),第425、426页。

② 《毛泽东选集》(袖珍本),第431页。

第二编 全民族奋勇抗战——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沦陷

大量地转入敌后,分散配置,依托一切敌人未占领的区域,配合民众武装,向敌人占领地进行广泛猛烈的游击战争,并尽可能地牵制敌人于运动战中消灭之。所以毛泽东特别指出:“第二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也将是最困难的时期,然而它是转变的枢纽,中国将变成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①

第三阶段是收复失地的反攻阶段,这个阶段“战争已不是战略防御,而将变为战略反攻”,“并将表现为战略进攻,已不是战略内线,而将逐渐地变为战略外线”。所以这个阶段,我所采取的主要战争形式,仍将是运动战,但是阵地战将提到重要地位”。“此阶段内的游击战,仍将辅助运动战和阵地战而起其战略配合的作用”。毛泽东特别强调:在战略反攻阶段“收复失地,主要地依靠中国自己不断增长的力量,同时还依靠国际力量和敌国内部变化的援助”。“根据中国政治、经济不平衡状态,战略反攻在其前一时期将不是全国整齐划一的姿态,而是带地域性的此起彼落的姿态”。^②

在作了上述三个阶段的划分后,毛泽东总结说:“长期而又广大的抗日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犬牙交错的战争,这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以后抗日战争的实际进程与发展完全证实了毛泽东的科学预见。

认识战争发展规律的一个根本目的在于能动地、正确地指导战争,赢得战争的最后胜利。因此,毛泽东在对中国抗战为什么是持久战,持久战三个阶段的发展规律以及战争的主要形式作了分析后,又进一步就持久战靠什么取胜以及持久战的具体作战方针、原则作了深入探讨和论述。

^① 《毛泽东选集》(袖珍本),第433页。

^② 《毛泽东选集》(袖珍本),第436页。

毛泽东首先正确阐明了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指出抗日战争的性质是“全民族的革命战争”,因此它的胜利离不开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的政治目的,离不开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总方针,离不开全国人民的动员。只有“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这是持久战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①至于具体作战方针,毛泽东以“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作了高度总结和概括,也即:在战略上是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在战役战斗上,必须实行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这样才能变战略上的劣势,被动的不利态势为战役、战斗的优势,主动的有利态势。^②毛泽东并强调:实行这一方针“离不了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在作战形式上则要善于根据战争发展的不同阶段,正确地运用运动战、游击战和阵地战3种不同形式。^③

毛泽东还在《抗日游击战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对游击战争在整个抗日作战中的地位、作用作了重点考察和论述,他指出:“游击战争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仅仅次于运动战,其战略作用,一是辅助正规战,一是把自己变成正规战,即向运动战发展。”针对某些人头脑中轻视游击战争的思想,毛泽东指出:“和正规战争相比,游击战争虽然没有那样迅速的成效和显赫的名声,但是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战争中,游击战争将表现其很大的威力,实是非同小可的事业。”^④

① 《毛泽东选集》(袖珍本),第448页。

② 《毛泽东选集》(袖珍本),第451页。

③ 《毛泽东选集》(袖珍本),第455页。

④ 《毛泽东选集》(袖珍本),第457页。

第二编 全民族奋勇抗战——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沦陷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等文中还突出阐明了人民战争的光辉思想,提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著名观点。^①毛泽东提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②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文中详加阐述的有关持久战、游击战的精辟思想,是中国抗战以来10个月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对“亡国论”、“速胜论”以及轻视游击战争等等错误观念、论调的有力批驳。毛泽东以及中国共产党其他领导人此一时期就抗战路线、方针、前途等问题所进行的深入探讨和一系列重要文章的发表,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信心。对相持阶段到来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深入开展和及时动员、组织、指导全国军民进行持久抗战、全面抗战起了重大作用。

本章小结

武汉地处中原,为水陆交通枢纽,南京失守后,更成为中国抗战的大本营。故日军大本营视攻占武汉及广州为一举结束中日战争的最佳时机。保卫大武汉成了全国各界人士的共同呼声。中国政府鉴于武汉之得失为国内外所瞩目,无意轻易放弃,决定发动武汉保卫战,因而在武汉会战准备阶段和进行期间,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战迅速达到高潮。1938年3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订的《抗战建国纲领》成为各政治派别所赞同的政治纲领,国民参政

① 《毛泽东选集》(袖珍本),第476页。

② 《毛泽东选集》(袖珍本),第437页。

会的召开象征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团结的加强。武汉会战期间,国共两党显示了团结合作的姿态,国民党在政治上采取一些开明措施,使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得以在武汉等地广泛开展,掀起了“保卫大武汉”的热潮。中国共产党驻武汉的机构积极参与了保卫武汉的动员宣传工作和献金活动。同时,八路军、新四军及共产党领导的民众武装则在华北、华中敌占区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有力地配合了武汉会战。

武汉会战开始后,日军先后投入了12个师团的兵力,从长江两岸及大别山北麓地区进攻武汉。军事委员会决定守武汉而应战于武汉外围,利用豫南、鄂东、赣北的山丘湖沼地区与优势日军周旋,会战的最终目的并非死守武汉,而是利用武汉保卫战尽可能消耗日军的力量,此种战略构想比较恰当,因而中国的官兵以同仇敌忾的精神,巧妙利用地理形势,在富金山、大别山、金官桥、田家镇、万家岭等地均重创日军。日军虽占领了武汉,但付出了伤亡达10万人的高昂代价。中国的野战军主力并未被摧毁,中国政府和人民也无意向日本屈服妥协,日军速战速决的企图归于失败,且其兵力随着占领区的扩大而日感短绌,结果不得不停止在中国战场上的大规模战略进攻,转入持久战态势。

武汉会战前后,日军还在华南采取军事行动,先后占领了厦门和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海南岛及潮州、汕头地区,加强对中国东南沿海的封锁,企图切断中国的海上补给线,以便孤立窒息中国。